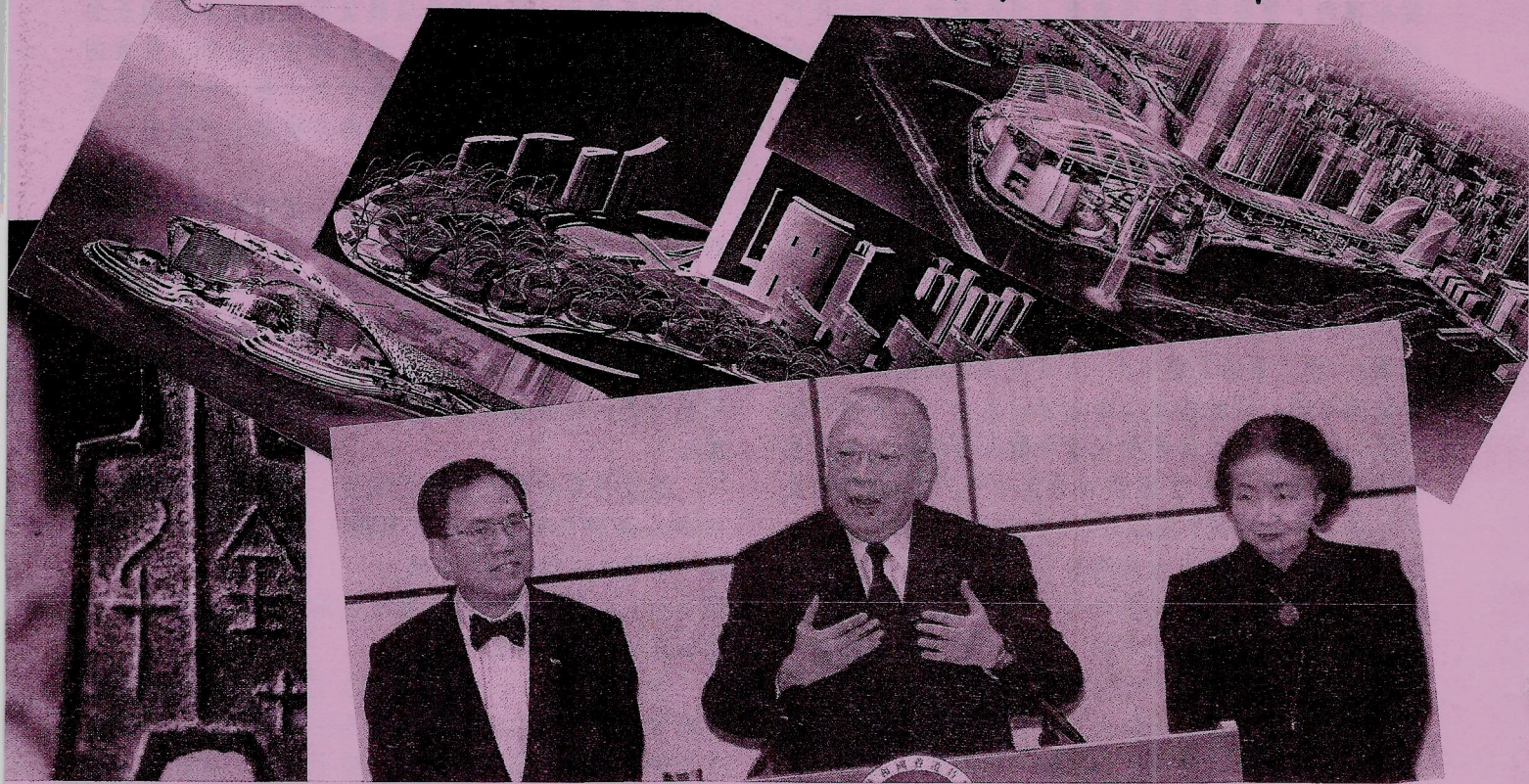


反對官商勾結 損公肥私



社會不公 更激化官民矛盾

第四國際對當今世界的評判

生態與社會主義 南美的新反抗

俄羅斯：普京的連續性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反對官商勾結、損公肥私

振言

香港在回歸後，並沒有由港人民主治港，而實質上只是商人治港。

政府高官一直進行官商勾結，把公眾利益不斷輸送給大財團、大資本家，幫助他們大獲巨利，許多商人都因此得益，不少人更升上富豪榜，而高官本人也從中獲利。這個香港官場毒瘤，早在英帝治港時代已經生長，回歸後更加惡化。近幾年揭露出一連串大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醜惡事實。

一、大賤賣紅灣半島

最近，由於高官這種劣跡惡行高度激起民憤，一些典型事例被廣大市民所揭發而強烈反對，其中最明顯的是負責的高官賤賣紅灣半島給大發展商，使後者在今年2月樓市開始上升時，以5.83億元的成本，再補地價8.64億元買斷業權；到11月底宣佈全部清拆、重建優質樓宇時，估計將來扣除全部成本後，可得淨利潤60億以至100億元（如果豪宅價不斷升漲的話）。在發展商這樣宣佈後，立即激起全港市民非常強烈的反對，認為如此把從未住過的7大座簇新樓宇清拆，不但浪費社會資源，製造大量廢物，產生環境污染，而且無法教育現在及以後的下一代。市民普遍而強烈地譴責該兩地產商只要謀取暴利，不顧一切惡果的意圖，民間團體計劃要採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行動，去反對有關的地產商。在這樣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發展商同時也考慮到拆建所遇到的阻難（例如當局可能不批准改變發展總綱藍圖，以致不能重建為豪宅），而且幾年後有物業跌價的風險等因素，最後迫於宣佈放棄拆建，改為重新研究改裝樓宇出售。一場拆建大風波才告稍息。但即使改裝出售，業界推算也有近10億元淨利，這反映出，港府如果自行分開出售，也可有如此多收益的。但這一不拆建改變，却惹來不少地產商，如恒隆陳啟宗便發表謬論，謊稱香港是中國最共產的地方，商人是罪人，普選會嚇走商人把資金轉投別處，等等。如此以危言聳聽，胡言亂語，攻擊廣大的反對拆建紅灣市民。

在這一事件中，必須直接負責的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他推說沒有預料到房地產會漲價，和地產商會拆建（但在合約中却刪除了許多限制拆建的條款），竟以非常低的價格大賤賣。這當中有無私人利益輸送，損公肥私？已經引起公眾質疑，必需由立法會組成獨立委員會，或者由政府審計處、廉政公署、申訴專員等進行徹查，以昭公允。但無論會否官

官相衛，不作徹查，這首先已反映有官商勾結、賤賣公產的事實，擺在公眾眼前了。

二、愉景灣被長期霸用

愉景灣事件，是公眾權益因官商勾結遭到損害的長期存在例子。它由離島區議員容詠嫦經多年調查而去信審計署，才得以暴光。審計署在立法會上發表的報告書中，揭發了現仍在發展中的大嶼山愉景灣發展項目，由於多項改動，發展商均未被要求補地價，令政府庫房損失巨大。

報告批評，發展商香港興業，把愉景灣由原先規劃的渡假村，改為發展成純住宅項目，港府卻毋須該公司就修改發展補地價。於85年任布政司的鍾逸傑，當時以「發展項目繼續按照目前已批的發展計劃，而且在原則上並無大改變」為理由，未有將愉景灣更改發展用途，提交當時的行政局或土地發展政策委員會審核。

香港興業由商人查濟民創立，而鍾逸傑退休後，也加入查濟民家族的名力集團，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繼續大力倡議開發大嶼山。（見12月3日、6日《經濟日報》）這是當時港英僅次於港督的高官與商人勾結利益輸送的典例之一。

而在11月26日，《蘋果日報》已報道：香港興業無補地價把愉景灣由渡假村發展成住宅事件令人嘩然，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擬介入調查追究。地政總署發言人表示，留意到愉景灣的總綱發展藍圖涉及的改動，可能牽涉補地價，現正進行研究，會視乎結果決定是否採取適當行動。

愉景灣被霸佔的官地並非一小塊，而是有4.12公頃，地產商今天仍在繼續發展它。在74至94年間，共增加了60萬平方米以上地盤面積，致使庫房損失了約100億元的收入。

三、領匯化公為私 不利公屋居民

房委會推行公屋商場及停車場賣給新成立的領匯公司，把公產變成私有化，領匯將來由私人集體操控，可以隨意加租，使小商戶負擔可能大大加重；或者租與超級市場，壟斷公共屋邨的民生百貨等業，使居民購物缺少選擇機會，等等。這是當局明益富商和私有財產者而損害公眾，尤其是公屋居民利益的做法。

因此，公屋居民由兩人出頭提請法院判房委會違

法，申請司法覆核，高院和上訴庭法官認為有可爭辯的理由，批准覆核，但卻判兩居民敗訴；而且，在容許上訴時，又接納房委會律師的專橫請求，把應有的28天上訴期限大減為44小時，逾時便失去上訴權利，這使得原訴人難以作上訴的準備，是前所未見的法律上不公平的表現。而在原告人申請覆核之前，法援處又拒絕了他們的法援申請，幸而得到熱心人士支持，才得以進行。

在這個過程中，又一次證明了：法律和法院實質上是為統治者及大資產者服務的。中國民間一直流行的「官官相衛」、「官字兩個口」等諺語，確是一語道破，幸而最後在社會正義的要求下，終審法庭拒絕了房委會及其律師的同一專橫申請，不批准後者的限時限刻指揮，而維持28日的上訴時限，從而使領滙不能依時上市，使原訴人盧少蘭的正義得到初步伸張，儘管房委會明年仍可能再行上市。

四、數碼港獨益一家

港府幾年前推行的數碼港計劃，不實行公開招標，便由負責的高官只給予一間大公司（電訊盈科）單獨包辦，至今多年由該公司負責租給科技公司經營的面積十分之少。這既表現當局如此的數碼港計劃既很不公平，只益了單一企業，又大大浪費了土地等公共資源。但當局並沒有從中得到教訓而反省，改變單只給予一個財團的偏幫政策，反而意圖在西九龍更大規模地重演。

五、西九龍讓又要讓單一財團獨佔

西九龍名義上被定為文娛藝術區，而可建成豪宅的數量，等於5年來售樓數的幾倍，可壟斷豪宅市場，因此被喻為「得西九，得天下」，而政府受制，議價能力低。

但政府却採行黑箱作業，達致三大財團各提的發展建議書，又不公佈詳細具體內容，只向行政會議提交幾頁紙的簡報，便要行會討論，接納它的單一招標建議，各行會成員只可以查閱有關財務資料，但絕不公開，從而拒絕了立法會3大黨的公開資料要求，這等於由幾個高官一手包辦，獨斷獨行，把一幅約40公頃的公地交給一個大財團去掌管，雖然有預先規定財團可佔用的建築物面積比率，都被3份建議書的比率大大超出了。將來獨得後，更會逐步出術，蠶食這塊「文娛」公地，像上述幾個事例那樣，終於大量變成「地產項目」。

許多社會組織和人士都紛紛要求當局公佈3個建議

書的財務資料，不能當市民甚至立法會議員都是「阿斗」，盲目信任負責高官，要立法會蓋上個橡皮圖章，授予全權給他們去進行利益輸送，以致人們將來損公肥私，文娛藝術的目的蕩然無存，有名少實。鑒於大財團唯利是圖，才會積聚有偌大的資產，寄望於它能夠不謀私利，而熱衷於公眾的文娛藝術事業，這未免太過天真，等於將公眾的巨大資產孤注一擲，作最壞的賭博！

因此，社會人士都聯合起來，成立共同組織，訂定合理有效的計劃，要求政府公開資料，取消單一招標建議，以集合全港市民的意見，實行民主的計劃和監督。這些意見，才是真正有利於推進全港的文娛藝術事業的。

六、鍾麗幗明目張胆損公肥私

港府高官離職後不久即轉投私人財團或企業，利用過去的有利條件及所知資料替後者服務，這種例子過去已屢見不鮮。最新而明目張胆違反退休規定「過冷河」制度的，是鍾麗幗。她在03年11月從房屋署副署長職位退休，今年4月便出任恒基旗下香港小輪業務發展董事，其後頻頻亮相推銷由恒基獨資成立的「香港薈萃」提出的西九龍發展大計，香港薈萃是西九龍項目三個入圍財團之一，在恒基日前舉行記者會，宣傳其西九龍發展計劃時，她曾一起出席作介紹。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在她出任該董事前，曾加以批准，顯示他也視「過冷河」制度為廢物；在被社會指責後，仍說她不涉及利益衝突，實則是「官官相衛」，也會為他自己將來樹立可援的先例。本來，高官退休時，原已領有一大筆退休金，和以後享有可觀的長俸等，生活完全優哉悠哉。以鍾麗幗為例，她已領了430萬港元退休金，以後每月可領有長俸7.8萬元，又永遠享有免費醫療服務等等。如此優厚待遇，她還要急不及待地破壞當局的形式上規定，在被公眾指責要求她不要再有利益衝突情事後，她仍強辯「問心無愧」，可見她的心是「良」還是「貪」的，已經畢露無遺了。

鍾麗幗事件表明，港府的法例對退休高官是優待的，正如在任時的薪酬待遇一樣，而且，不祇是對鍾一人這樣。因此，退休高官再就業的條例必須重新檢討，訂立嚴限機制和條款，並須切實執行，以杜絕損公肥私，維護社會公道。但這是要靠市民發揮力量，才能真正做得到的！

2004年12月15日

立法會選舉面面觀

十月評論評論員

9.12 立法會選舉的結果，顯現出 7.1 效應的延續。178 萬選民以高近 56% 的投票率(比上一屆約高 13%)，顯示出更多港人要用選票表達意願，政治參與意識大為提升，為香港的民主發展起著促進作用。

泛民主派總得票 110 多萬，比上屆多 30 萬票，得票率 63.2%，証明大多數港人支持 07/08 年雙普選。其中民主黨得票 45 萬，比上屆增加 4 千多票，佔總得票率 25.3%，比上屆下跌 7 個百分點；民建聯和工聯會共得票 45.4 萬，比上屆多 6 萬票，佔總得票率 25.7%，比上屆下跌了 4 個百分點。

但在議席方面，兩大陣營所得席數卻與得票率不合比例：民建聯連工聯會共得 13 席，成為立會內第一大黨；自由黨得直選 2 席、功能界別 8 席，成為第二大黨；民主黨共得 9 席，淪為第三大黨(雖然其得票比民建聯只略為少些)。因此，在新立法會中，親京和保守派共佔了 30 多席，成為多數。這主要是北京中央以前刻意安排好的機制(如直選與功能界別各佔一半等等)所造成的，縱使泛民主派在直選中得票及其比率已佔了將近三分之二。

民建聯輸了選票，卻贏了議席，更是由於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汲取了去年區議會選舉慘敗的教訓，動用龐大的人財物力，依靠強固的組織和動員力，加上配票策略等佈署週詳，打出安定繁榮牌爭取部份中產和資產階級的支持等。

民主黨遭到挫折，不但由於它沒有民建聯那樣的有利條件，反而受到北京大力打壓，同時也由於本身的弱點，其政綱、政治表現和地區組織都乏善可言，其領導失策更是明顯，譬如由「心戰室特派員」、「政黨大腦」羅致光指揮選戰，他既一開始便自動放棄競選連任，又對選情「後知後覺」，從頭到尾都在打李柱銘告急牌，連票站調查顯示李柱銘得票已足夠當選，也未能及時停止告急，以致李柱銘得票太多，致令何秀蘭敗於民建聯的蔡素玉。民主黨第二梯隊候選人也全部落敗！

選民選出泛民主派 25 名議員，未能達到 30 名的目標。而令人矚目的是選上被對手所稱的「三大惡人」——長毛梁國雄、鄭經翰和詹培忠。長毛長期住於公屋，了解及同情基層大眾困苦；他更身體力行，不斷上街反對不合理事物，為市民爭取民生權益和民權利，因而有「街頭鬥士」的稱號。他在選前的多個競

選論壇、擂台上暢談政綱主張，批駁對手的錯誤言行，從而得到不少市民，尤其是年青人和普羅大眾的讚賞、認同，最後能贏得 6 萬多高票當選！

鄭經翰和詹培忠素以敢言敢批見稱；「反叛民主派」的張超雄和郭家麒、譚香文相繼當選，反映了業界要求革新的廣泛訴求。祈盼他們與其他民主派甚至獨立派議員一起，制衡保皇黨、保守派，為新一屆立法帶來新氣象！

面對新局勢，預計京官將會向部份議員進行統戰、拉攏、分化，企圖削減泛民主派的力量。

北京高官已為其支持者再次取得多數議席而表示欣慰，陳佐洱並稱讚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地方選舉」，這等於承認港人已在政治上成熟，具備足夠條件能在 07/08 年實行雙普選了！

但令人不滿的是，由於選委會措施諸多錯失，使這次選舉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混亂的選舉。許多選民和社會人士提出了大量投訴，指責投票站內的紕漏、可疑事件。報章歸納出有 9 大質疑(例如，不少票站主任沒有有關參選人的代理在場便打開票箱，以及趕走一些參選人代理然後封票箱，等等)。但選委會主任胡國興仍不肯承認各種失誤，強詞狡辯後，《明報》再以頭版大字標題指出「選後 3 天，六大疑團仍未釋」，反駁他。因此，部份候任立法信議員提出要求特首成立獨立委員會加以調查。

勝利衝昏了政客的頭腦。田北俊在選後第 4 天，便公然建議在 3 年內完成 23 條立法，顯然是想討好中央，為自己去年的臨陣倒戈贖罪。民建聯的譚耀宗也立即予以附和。但翌日卻遭到董建華的拒絕，表示目前不考慮重新展開 23 條立法程序。

保皇保守派在選後就迅速重現其固有本質，又一次給港人看透，許多聽眾致電台齊聲加以指責。保皇份子以後還會在立法會內外串演出許多背叛港人權益的醜劇，遭到立會內其他議員和社會人士的譴責、反對！

新一屆立法會應該有新的景象、創意，討論及爭取政制民主改革和 07/08 年雙普選，阻止通過那些損害大多數港人(特別是低下階層)權益的提案！泛民主派還應該盡量把廣大市民的意見在立法會上表達，為基層大眾說話、爭取權益，同時組織基層群眾，以便更有效地發揮民眾的力量。

2004 年 9 月 17 日

〈加拿大通訊〉



大陸人民對 長毛當選的反應

浪果

幸虧有科技的進步，使得遠隔重洋的加、美觀眾和聽眾，很快便能看到和聽到香港發生的新情況、新事物。以近幾月來的香港立法會競選和選舉結果等新聞來看，都是吸引加、美人民（尤其是僑胞）的注意的。其中對梁國雄（長毛）的競選辯論、當選及其後的言行表現，好評和咒語都如流。有人認為，他能高票當選，不但是他個人的突破，也是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突破，影響深遠；除香港外，在台灣和大陸，都會起到實質的反應。

舉一例來說，10月28日《明報》加西版的《明坊》上，刊登了「文人散墨」專欄作家蘇廣哲先生題為《中國大陸人看長毛》一文，介紹他在互聯網上看到的中國網民對長毛當選後的反應。該文如此指出：

長毛入立法會，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也有轟動效應。以《人民日報》「強國論壇」來看，網民讚賞長毛的遠比反對者多。例如：「長毛好比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東帝汶的古斯芒，了不起！」「長毛的言論如燈塔照亮了香港人民前進的方向。」「此人表面粗魯，其實聰明絕頂。方面闊耳、手長過膝、完全是聖人相。」「長毛的出現令死氣沉沉的香港政壇帶來了一股新風和活力。」「愛中華，頂（支持）長毛」；「長毛同志敢想、敢闖、敢革命，是香港人民的救星。」

其中也有更大膽些的，像「為在大陸監獄中的長毛吶喊。」「支持背心口號」。後面這一句很隱晦，所以能避過網警耳目。……更應一提的是，大陸網民比香港人注重長毛是捷古華拉崇拜者這回事。……

此外，有好幾名網民不約而同說，長毛反對《基本法》，因為《基本法》是港英強塞給香港人的。

我想，這些網民並不是如此無知，而是如果正確說出，是中共強塞給港人的，會給網警刪掉。

2004年11月10日



社會不公， 更激化官民矛盾

張開

中國資本主義化，使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大行其道，其特色是社會收入分配不公，日益向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造成民怨民憤日益加劇，結果是社會抗爭頻繁爆發。

民間抗爭頻繁

《華盛頓郵報》引述中國一份內部資料稱，中國2003年發生了58,000宗較大的社會不安事件，平均每日達160宗，而且衝擊黨政機關的事件也頻頻發生。當局的統計顯示，2003年的社會不安事件比02年增加了15%，同10年前相比，更增加了7倍。〈1〉

04年全年的社會不安事件，還未見到統計數字，不過，單在10月12日至21日這11天內，就有16個市的居民、職工發生了500人以上的抗爭、騷亂，其中，遊行、示威、集會的規模超過3000人、發生警民衝突的就有6宗。〈2〉其中萬人以上抗爭，全年已有多宗。

以10月18日爆發的重慶市萬州區的騷亂來說，因有西方記者在重慶採訪，事件得以向外曝光。19、20日新華社《內參》也作了報道：事態趨於惡化，是18日下午6時至晚上11時，聚集的群眾多達8千多人（11月9日《經

濟日報》說有逾萬人），7輛公安車被砸、被燒，抗議幹部欺壓百姓。19日凌晨，成千群眾衝進政府辦公樓，有15個辦公室被破壞。上述《內參》在分析此事件時說：「從事態演變，市民借一宗常會發生的事來發洩、表達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對幹部的反感情緒……。這是社會、政局隨時會發生危機的訊號。」

〈3〉

漢源農民大抗議

跟着爆發的是四川省漢源縣數萬農民的抗議行動。據《明報》引外電和有關消息報道，由於政府與電站發展商合作，將養活10萬人的肥沃良田說成高山峽谷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賠償標準來安置受影響的民衆，並動用公安、武警逮捕和驅散不願搬遷者，導致漢源民衆強烈不滿。在多次上訪、請願無結果的情況下，上月（10月）27日晚上，數萬民衆自發前往電站地盤，阻止施工。

當局調動公安武警鎮壓，民衆因此被激怒。28日，數萬民衆聚集漢源縣城抗議，他們邊高喊「共產黨萬歲」，邊衝擊縣委、縣政府大樓，該縣學校和公家機關因此停課和停工，政府癱瘓，而當地唯一火車

站亦癱瘓、省道漢源至樂山公路全面阻斷。法新社引述當地民衆說，衝突中有2至3人死亡，另有許多人受傷送院，而專程趕往漢源的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更一度被數千民衆圍困在政府大樓內數小時。據消息稱，張學忠在了解民衆抗爭訴求後，指示重新制定補償辦法。〈4〉

中共中央把漢源抗爭定性為「10·27不明真相的移民大規模聚集事件」，表示不追究參與抗爭示威的一般群眾。這表示：非一般的為首或領導份子要追究。

鳳凰衛視言論部副總監何亮亮撰文宣稱，中央對漢源事件，如果定性為破壞社會穩定的惡性事件，就應該動用武力解決，可以迅速平定，但是肯定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涉及大批農民，而且目前內地此類因徵用土地而發生的糾紛事件此伏彼起，因此不輕易用強硬手段。〈5〉

這顯示他也承認這類事件「此伏彼起」，反映出民衆抗爭力量的非常強大。如果再像過去那樣武力鎮壓，在民衆怨憤普遍而激烈的今天，很可能引發星火燎原，難以控制。

生產事故高發期和不穩定危機頻發期

資產階級唯利是圖（部份廠礦管理層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只顧追求更多的利潤，為此加緊剝削勞動力，產生無數的工業傷殘死亡事件。最近，河南鄭州大平煤礦就是一個典例，管理層為了自己的生產獎金，不管該礦數日前發生大火等不安全危險，仍強迫礦工下井採煤，以致166名礦工遭燒死。10月22日《文匯報》指出：「其實，不僅煤礦生產安全，全國安全生產的整體形勢均呈嚴峻狀況。據國家安全監管局統計，近年來全國每年發生的各類事故都在100萬起左右，死亡人數近14萬人。」目前正處於「安全生產事故的高發期」。這也意味是工人抗爭高發期，以抗拒資方的加強剝削，維護自身的權益和生命健康。

與此同時，中央黨校國情國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連玉明又指出：部份「大中城市也邁入『非穩定狀態』的危機頻發期」。〈6〉

長期以來，中國的黨政領導對突發事件和危機處理都是採取盡量封鎖或淡化的手法，以致中國的統計

數字並不完全。在北京最近召開的上述有關的新聞處理專題研討會上，有專家指出領導不應該用「捂」（封閉）的方式，而必須採取主動態度給予公佈，否則會「導致矛盾進一步激化。」〈7〉這反映出專家對中共封鎖新聞的不滿。

在9月召開的中共16屆4中全會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其背景就是由於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多」，這是矛盾激化、官民衝突等「群體事件」加劇的婉轉說法。

11月10日，《解放軍報》發表評論《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表示，「一個執政黨如果長期不能取得令人民群眾滿意的政績，不能讓人民群眾的生活有較大改善，被時代和人民所淘汰也就成為必然」。「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存亡的決定因素。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權，一旦失去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援，必然垮台。」〈8〉

這些警告當然不是無的放矢、無病呻吟，而是反映出中共政權正陷於「失去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危機中。這個危機主要是由於各級黨政幹部長期享有的政經特權和官僚主義，造成與人民之間的基本矛盾和對立所造成的。

最高領導人的對策

胡錦濤在接掌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和兩個軍委會副主席後發表報告的時候，曾信誓旦旦地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新三民主義」的理念，擺出一副開明的形象。但在今年9月的中共16屆4中全會接任江澤民的中共軍委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時候，據說却在閉幕會議上發表了講話，批評「國內媒體打着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並指摘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社會主義的叛徒，蘇聯、蘇共正是在他「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衝擊下解體。胡錦濤還批評了黨內幹部主張推進政治改革是「製造混亂」。〈9〉

在胡錦濤這樣地講話10天之後，中宣部根據四中全會精神召開全國媒體會議，下達文件提出二十九條不准報道的內容，包括農民上訪、土地拆遷、官民衝突等。中宣部還明文向各地下達通知，要求各級報刊「不得擅自報道有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及罷工事件」，只可發新華社統稿。最近，有媒體又報道中宣部下達新的文件，將焦國標、余傑、李銳、茅于軾、王怡等黨內外自由知識份子列入禁止報道名單；御用文人也「拿起筆作刀槍」，對社會輿論討論「公共知識份子」問題，上網線上線大加撻伐；日前中國當局開始封鎖Google的英文版新聞網站。〈10〉

這些報道如果全屬事實，那就表明，在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共面對着「『非穩定狀態』的危機頻發期」，仍繼續採用新聞封鎖等手法，甚至變本加厲，尤其是不願作政治體制民主改革，這只能像上引專家所斷言的，「導致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恰恰由於胡錦濤繼續沿用過去的傳統統治方法，社會的、官民之間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激化。這種形勢，反映在如下兩則報道上：

其一是：胡錦濤在最近的中央工作經濟會議上，反覆強調「憂患意識」，比諸03年的同樣經濟工作會議上，更在「增強憂患意識」前面加上了「必須」兩個字。他在日前的這個會議上，還列出了當前的4大問題：1.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基礎不穩固，「三農」工作要加強；2.物價上漲的壓力增加，有可能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3.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不少，特別是近期的群體性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4.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一些長期性和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要強調體制性改革。〈11〉他這些說法自然是隱晦不詳的。

其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佈「2004—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分析困擾着當代中國發展的六大問題：

1. 農民失地引發社會矛盾。目前中國約有4,000萬失地農民，關於土地徵用的法律制度滯後，土地徵用補償安置費偏低，是造成農民失地後社會矛盾和衝突的主要原因。
2. 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具體表現為不同收入者之間、區域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3. 就業形勢面臨長期困難。目前中國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達到2,400萬人。但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最多僅900萬左右，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4. 腐敗案件不斷出現。高官貪污腐敗已經從生活腐化型發展到貪婪攫取型，……更重要的是需要進行制度建設。
5. 快速發展受到資源狀況、能源供給和環境承受能力的約束。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較低，但利用率卻很低，浪費也比較嚴重，污染物的排放總量更遠遠超過環境自淨能力。
6.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高通脹直接影響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滿意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更影響了他們對社會的態度和信心。〈12〉

以上的難題還只是當前存在的許多難題中的一部份。要有效解決中國當前的重大難題，只有進行徹底的民主政治改革，但這已經給胡錦濤堅決拒絕，因而他所容許的「體制性改革」並不是指「政治制度改革」，就無疑問了。

2004年12月17日

註釋：

〈1〉04年11月7日《蘋果日報》報道。

〈2〉、〈3〉詳見《爭鳴》11月號羅冰文所引。

〈4〉見11月9日《明報》專訊。

〈5〉、〈6〉見11月11日《文匯報》。

〈7〉12月1日《文匯報》。

〈8〉轉引自11月7日《明報》《論壇》歐陽五的《神州點晴》。

〈9〉、〈10〉轉引自12月7日《蘋果日報》《論壇》張偉國文章的引述。

〈11〉12月13日香港《經濟日報》報道。

〈12〉12月15日《文匯報》載該報北京新聞中心記者14日電。

醫療費用高漲 農民看病倍難

軍行

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造成了許多方面的惡果。筆者在大半年前曾以《資本主義化帶來的日增惡果》為題，談論了其中幾方面的問題。〈1〉現在，特針對人民的健康醫療方面加以評述。

人民病苦日增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日前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環境記者協會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指出，中國過去多年來快速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及能源危機。目前流經城市的河流九成受到嚴重污染，有近三億農民飲用不合格食水，全國近三分之一人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空氣環境中。〈2〉

這對城鄉人民的生活、健康將產生很壞影響，增加人民（尤其是農民）患病的危險。

另一方面，經濟迅速發展，03年與97年相比，國家財政收入劇增1.5倍，總人口增4.5%，但醫院、衛生院數目反而減少7.3%，醫生人數減少6%。〈3〉政府又逐步取消幾十年來已有的醫療福利措施，實行「一切向錢看」，國家醫院等看病取藥不但收費，而且增幅很高，遠遠超過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幅度，由此大大增加了人民的病苦和困難。

據《信息時報》報道，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主任饒克勤說，雖然中國居民收入增加，但幅度不及醫療費用漲得快。調查者比較了1993年到2003年的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的變化情況。結果發現，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在排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後，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兩種費用分別為21元和933元；到了2003年，就已經升到了75元和2,233元。另一方面，患病的人却增多了。據衛生部在1993年、98年、03年進行的3次樣本人口近20萬人的調查，推算到中國患病人次數，在10年內增加了7.1億，達到50億。患病的人雖然增加了，但調查所得，看病的人却少了；城鄉居民的兩周就診率從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與十年前持平，為3.6%。同時，城鄉

居民兩周患病未及時就診的比例也近五成。在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經濟困難，其比例在城市和農村中分別為36%和39%。此外，調查者還對患者出院的原因進行了調查。結果，有43.3%的人是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是因為經濟困難。〈4〉在實際上，有很大數量是因為交不出錢而被醫院拒絕留醫，甚至被趕出去的。（報章報道，曾有一人肚皮破裂開，腸臟外露，仍被趕出醫院，睡在路上。）

《明報》在同一日也報道上述的《中新網》消息時，還引述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的話：目前大醫院門診的漏報情況比較嚴重。很多醫院門診往往替肝炎等傳染性病患者檢驗後，不注意上報，容易造成疫情擴散。目前還存在信息交流不暢、整體協調不靈的問題。

這番話等於間接承認了各醫院和門診部提供的數字是不完全的，因而實際情況會更嚴重。

醫療費用劇升

較早些時候，《中國經濟時報》已引述中國衛生部統計顯示，衛生部直屬醫院門診病人人均醫療費用高達163元人民幣，其中藥費佔總醫療費的6成，即約近百元。而今年9月全國城市居民平均家庭收入僅得713元，若家人不幸患上病而又沒有購買醫療保險的話，整個家庭當月就要拿出2成2的收入來醫病。衛生部數字顯示，衛生部直屬醫院住院病人人均醫療費高達7千多元，藥費約佔整體醫療費近5成。在這樣的情況下，升斗市民就要拿出差不多5個月的收入來醫病，負擔非常沉重。居民到普通醫院看一次病平均亦要花上79元，住院平均費用亦近3千元。醫院藥費持續高企下，中國消費者協會一份統計報告指出，中國約有5成人生了病不敢去醫院求醫。《中國經濟時報》的分析指出，「藥品暴利是老百姓心頭的一塊巨石，使許多沒有醫保且收入低的居民看不起病，買不起藥。」

內地報章指出，醫院藥費高昂的其中一個原因，

和內地醫療體制有關。在「以藥養醫」的機制下，售賣藥品成為醫療機構收入的重要來源。〈5〉

上引的調查顯示，城鄉居民兩周患病而沒就診的比例近5成，由於城市居民就診的比例會較農村為高，因而農村的病人就會有5成以上不能去就醫，亦即全國農村有5億人有病仍不能就醫。

中國嬰兒一出世便要遭受市場經濟的災難：分娩費用從20年前的幾角幾元，飆升到今天的3千多4千元，漲幅達100倍。

因貧賣血等緣故而傳染上愛滋病的人，據官方宣佈的數字是現有84萬病毒帶傳者，逾9成愛滋病人無錢醫治，而醫療保險、公費醫療等領域還沒有向愛滋病治療開放，部份地區正面臨集中發病和死亡的高峯。以廣東省來說，03年感染人數比02年增加了18.3%，累計報告愛滋病感染者人數居全國第5位，其中集中收治愛滋病患者的市第8人民醫院目前共收治400多例。以上是廣東省愛滋病防治專家委員會委員、廣州市第8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蔡衛平向記者透露的。〈6〉這一收容率實在是很低的。但國際愛滋病專家認為，中國的實際數字遠較官方的84萬患者的數字為高；世界衛生組織推算，假如中國不採取強硬措施，當地愛滋病帶菌者人數在2010年將上升至1,000萬人。〈7〉

農民患病乏助

長期來被歧視而很少得到國家醫療照顧的農村農民，遇上醫療費高升而生了病，尤其是大病的時候，景況就更加困苦乏助。

據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日前指出，去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一次為2,236元，由於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農民如果得了大病，他們一年的現金收入不足以支付一次住院費用。

從以下越來越多地流傳的部份民謠中，可反映出農民的苦況：「小康小康，農民生場大病全泡湯」；「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住一次院，一年活白幹」、「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

也因為如此，全國有逾半農民看不起病，其中，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至8成。

為解決農民看病難問題，中國政府前年10月提出，逐步在全國建立以為農民治大病為原則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自願參加的農民，每人每年將10元繳交到鄉財政所或鄉鎮衛生院，再由縣財政局存入醫療基金備用戶口。

上述款項連同各級政府每年每人補助的20元一起，形成基金。而參加了醫療合作的農民，每次到縣或市指定醫療機構求醫時，可直接報銷部份醫療費用。

不過，農村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問題，令人對這制度感到憂慮。對此，朱慶生強調，決不強迫農民參加，參加者必須是自願的，以確保醫療資金不被挪用和侵佔。截至今年6月底，共有6,899萬農民參加這項醫療工作，已有4,194萬人次的醫藥費用得到報銷。

但是，仍有近90%的農民無法參加，他們仍面臨病無所託的困境。〈8〉這表示，從政府提出實施到今年6月底，已經過了21個月，但仍只有10%的農民自願參加。至於近90%的農民「無法」參加，則何以會「無法」呢？

這表明是因為農民連每人10元（全家人合計便要幾十元）也「無法」繳交，反映出農民的窮困已到達什麼地步！而且，各級政府每年補助20元，這如果所指「各級」中的鄉鎮政府都要負責補助，則後者的財政狀況也將很難負擔，因為全國鄉鎮政府、村委會的債務問題已日趨嚴重，有關專家估計，鄉村債務總額已超過一萬億元，平均每個農民要承擔一千多元（等於其年均收入的4成）。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白景明指出，鄉、村兩級組織的巨額債務已成經濟發展的包袱，不僅令農村基層政權的建設與發展滯後，一些地方甚至連基本的運轉都不能保證；大量的還本付息，不可避免地要擠佔農村建設資金，加重農民負擔，不利於農村的社會穩定。〈9〉

政府這樣的補貼，到頭來起碼有一部份是由農民負擔，等於「羊毛出在羊身上」，也更加表明當局的解決辦法是捨本求末，無法收效的。

中國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過去所享有的公共醫療等福利，是農民受到不公平對待問題之一。加上自己耕地和房屋被徵用或收購而強迫拆

還，却得不到合理的補償；農民工到城鎮謀生又受到歧視欺凌，以至拖欠工資等等，都加深、加劇農民的痛苦和抗爭。這是中國近幾年來爆發越來越多農民騷亂的主要原因。

2004年12月2日

註釋：

〈1〉請參閱本刊今年第1期（總215期）該文。

〈2〉04年11月30日《蘋果日報》載的《人民網》報

道。

〈3〉照今年第19期《求是》統計表數字計算。

〈4〉11月23日《文匯報》轉載的《中新網》報道。

〈5〉11月6日《蘋果日報》轉載。

〈6〉6月1日《文匯報》報道。

〈7〉12月2日《文匯報》載法新社《華盛頓郵報》報道。

〈8〉以上幾段均見11月7日《蘋果日報》載《新京報》報道。

〈9〉11月30日《蘋果日報》載《新華網》報道。

中國保健事業的衰退

米高·施禮伯

當03年沙士（非典）疫潮在中國爆發時，報道說該國許多地區的恐慌在散播着。有些居民在道路上豎立障碍物（街壘），試圖禁止外間的人進入，可能因為會替他們的鄰居和村莊帶來病患。

部份地區，尤其是在農村，由於害怕醫葯設備不能夠應付這種疾病，恐慌便如火上加油。近年來，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的改革，已經破壞了保健衛生，而診費的劇增又剝奪了許多窮人就診治療的權利。

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政府起初拖延處理這種傳染病，企圖掩蓋事實而不及早通報病例，致使疫情加劇而失去控制。世界衛生組織請求派出傳染病專家，到廣東省發生第一個病例的地方去，却遭到斷然拒絕。

到四月底，在幾個官員包括北京市長在內，因為他們掩蓋疫情而瀆職，受到一連串批評指責之後，政府迅速地增加反沙士的預防措施，但是，到那時候，這種傳染病已經蔓延得非常可怕了。

這種情況，重複了早期中國當局有效地同愛滋病戰鬥的失敗——甚至攻擊愛滋病人。這種情況，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在過去幾年中，就任由愛滋病毒傳播，致使150萬中國公民患上愛滋病。來自中國中部地區河南省的報告所描述的，在那個農村有超過一半的居民已經因愛滋病而死亡，或者趨於死

亡。

隨着1949年革命的勝利，中國在衛生保健方面取得了大進展。一個個大的衛生診所，在縣裏和城市中心醫院建立起來了。這種醫療制度依靠“赤腳醫生”的網絡，把保健的照顧帶到每個家庭，甚至最貧窮落後的地區。

所要強調的，就是佈置預防要做的事情；例如，全體居民被大量地動員起來，參加“愛國衛生運動”，去消滅老鼠、蒼蠅、蚊子、和其他害蟲。重要的工作是消滅環境的公害，完成和改善水的質量，像在計劃的，如污染河道的人糞的處理等。健康的改進是聯繫實際的，那就必須人人有工作，糧食要輸送給五谷失收的災區，和提高教育水平。

衛生運動的結果，像霍亂、鼠疫、傷寒和腥紅熱這些傳染病，差不多被連根拔掉了。據報道：到20世紀60年代，梅毒性病被消滅了。在中國，人均壽命從50年代的32歲，到達了1994年的71歲。

不幸的是中國不再組織群眾，以組成特定任務式的衛生運動。經濟的增長——建造工廠、道路，水壩——已經被放在健康保健和預防之上。更有甚者，減少政府資金，在許多地區已經削弱了衛生設備和反污染的措施。

據六月五日中國環境保護局的報道：國家的七條主要河流，有一半以上的流域被工業、農場和家庭污水所污染。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氣受到污染。有些疾病涉及到公共衛生——像肺結核、鉤蟲病、肝炎、瘧疾、痢疾——仍然是繼續存在的問題。

在中國，大多數的衛生保健對病人從來就不是免費的——雖然在其他的工人國家已經實行免費了（像現在的古巴和直到最近的越南）。

可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口的80%不得不從他們自己的口袋裏支付醫藥費。國有企業和政府機關，則為他們的僱員付給費用，並且有時候也為工人的家庭支付。同樣地，許多工人都屬於政府的保險計劃範圍。

在農村地區，農業公社倡議的合作醫療，涵蓋農村人口的80%到90%，總共達到國家衛生支出的大約20%。

到1993年，這種情況急激地改變了。公社已經解散，衛生計劃在農村覆蓋的人口不到10%，而中國的衛生經費只不過占財政支出的2%。現在，中國的私人家庭不得不負擔全國性支出的42%。

在城市，政府曾經試圖通過特許11家保險公司推行美國式的經營保險計劃。約有40%到50%的城市居民，仍然沒有醫藥保險。

近年來，政府花費在衛生設施上的費用已經大幅度地降低。因為診所爭相增加資金以便維持經營，收取更高的治療和醫藥費用，使比較貧窮的地區的服務惡化，已造成一種惡性循環。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一個縣的病防站，他們自己的預算需要提高56%，而婦幼保健中心則需要提高67%。

重要性已從預防保健計劃轉移到醫治服務，因為後者能夠產生更好的收入。診所和醫生同樣地成為醫藥公司的獵物，這些公司給他們提供引誘物，要他們對它們的產品更多地採用，而且用更貴的品種。

既然衛生工作人員的工資，經常依靠診所和醫院的收入多少來提高，在農村大多數合資格的工作人員就離開農村到城市去，在那里他們能賺到更多的錢。這個事實，連同醫藥設備的日益減少和供應的短缺，已經大大地惡化最貧窮的地區的保健，與此同時，費用却在猛漲。

研究表明，中國貧窮的農村人口要支付平均一次處方的醫藥費用，是他們每人日平均工資收入的二至五倍之間。許多人簡直沒錢服藥，延誤了病情，雖然服藥是必需的，例如，對肺結核的治療。199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平均一個醫院准許入院留醫，就花費了一

個貧困家庭每年淨收入的60%。嚴重的病能遺留給一個家庭的，只有赤貧。

簡而言之，中國的衛生保健正在愈來愈成為趨向我們在美國所見到的那種模式——熟練的醫生、現代化的醫學設備和最新技術，一般地只是為那些能付得起醫藥費的病人服務。與此同時，貧窮的人活該受病苦。

中國的衛生保健與古巴的相比較是有教益的。儘管承認古巴是一個小得多的國家，具有遠不相同的問題，保持着相類似的東西。像中國一樣，古巴隨着1959年革命和後來成為工人國家，不得不實際上從零開始，建立一個有功能的衛生制度（許多醫生已經永久地移居美國邁阿密）。

然而，又像中國以前一樣，古巴把它重點放在預防保健方面。例如，在古巴超過9成的一歲兒童，全部地接種疫苗防止疾病，像肺結核、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和麻疹等。可是，她又不像中國，古巴廣泛地提供衛生保健（包括送入醫院治療和牙科工作）全部免費。它的計劃執行的結果，古巴的保健典型的統計數字接近歐洲、北美和日本的統計數字，而超過發展中國家。

在20世紀90年代，由於美國加強可耻的禁運和沒有有利的貿易措施（由蘇聯從前所供給），古巴的保健制度處於壓力之下。醫院設有備用的常常不合用的醫藥已被嚴格地定型配給。可是，不是削減支出和正如中國所做的那樣實現私有化制度；而是增加它的衛生保健開支，在1989年到1996年之間超過了30%，古巴遭到了危機。

古巴的憲法清楚承認衛生保健是全體人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政府的基本責任。這是理所當然的。實行追求利潤的醫療制度就是自取滅亡，正如愛滋病傳染正在世界範圍內顯示的那樣。

期望中國的沙士病和愛滋病問題，會加強顯示全國勞動人民需要徹底改變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青萍譯自《社會主義行動》03年6月號）

俄羅斯：普京的連續性

大衛·塞波〔註〕著 兆立譯

〔譯者按：以下的文章開頭說的四點特徵其實都適用於中國，其中說寡頭統治集團是資產階級，這在中國更是如此。不過該文的最後一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說〔這個國家〕是否已有質的變化，仍是一個疑問，可見本文作者塞波先生還不認為俄國已是資本主義。這對中國是否適用，值得研究。〕

2004年3月俄羅斯的總統選舉，弗拉基米爾·普京再度當選了。這一次的選舉，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多大意義。如果有什麼迹象清楚地顯現出來的，那就是，它根本沒有改變這個政權及其社會——經濟政策的基本特性。

這些特性可以很快地被概括為以下四點：

- 一、一個不受約束的、徹底違反人民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個政策主要是使寡頭統治集團、腐敗官員這兩個互利互依的集團和外國資本得到利益。
- 二、俄國經濟繼續不斷地脫離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及其強烈依賴石油、天然氣和金屬等原料的輸出，因此，就缺乏使俄國脫離半邊緣地位的任何前景，以及這種缺乏在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平面上對整個社會所造成的結果。
- 三、普遍的腐敗以及法治方面缺乏有意義的進展；一個受行政部門管制的、可用金錢買得的司法系統（似非而是的是，對挑選出來的幾個寡頭統治集團成員的虐待，即表示法治的缺乏）。
- 四、“規約的民主”（*regulated democracy*）的保持，以及一個享有類似絕對權力的、排除人民大眾對政府政策有任何影響的行政部門，再加上對相對廣闊的政治自由的容忍，只要這些政治自由不威脅到行政部門的行動的絕對自由。政府在車臣所推行的恐怖主義政策就是一個起提醒作用的例子。顯示這個政權能夠做些什麼，當它面對着它認為會威脅它存在的抵抗行動的時候。

就寡頭統治集團成員而言，這個局勢將會保持穩定。普京已經顯示國家對寡頭統治集團成員的支配地位。但是這個資產階級大體上是對這個局勢非常滿意的。它不尋求直接行使權力。甚至於他們之中極端崇

尚新自由主義的人們，雖然對“規約民主”（他們的用辭）的受蝕流了鱷魚眼淚，但是對普京的經濟政策却一點都沒有加以指責。明顯的是，法治的缺乏在商業社會中引起不安全，但是考慮到他們的財富的罪惡起源，以及他們與國家的特權關係在他們的財富積累中所起的絕對緊要作用，法治對他們的威脅就會更大。

從絕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來看，什麼事情都沒有改變——儘管有了連續五年的經濟增長，生活水平還沒有重大的改進。

現在，勞動法規已被修改到反映工作場所中的真正力量關係，那就是經理部門的絕對權力。但是，除了這一點以外，普京政權在基本上還是與葉利欽在1993年10月派遣坦克炮擊議會以後所建立的政權一樣的。自從葉利欽1993年政變以來，在每一次選舉中，由總統或者政權所支持的總統候選人支配的資源一直是真正地不成比例的。此外，選舉的結果經常有假：

- 1993年12月的公民複決投票神聖化了目前這個總統擁有絕對權力的政治制度。這一次的公民複決投票就是遭受篡改的。投票人數低於新憲法上所定的最低標準，而這個新憲法還是葉利欽本人秘密草擬的。他所發動的政變使他能夠進行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答應過的“電震療法”。

- 葉利欽在舉行1996年總統選舉之前曾躊躇了很長時間。一群銀行家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明確地要求他不要把俄國犧牲在“西方民主”的祭壇上。他們把後者定性為“盲目崇拜”。當選舉終於被決定要舉行的時候，葉利欽說他決不容許共產黨再度當政。事實上，根據（俄國）聯邦安全部（其前身為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中一位高層人士的消息，共產黨候選人應該獲勝。

- 為了使普京在第一輪選舉中勝出，2000年的總統選舉的結果也是遭受篡改的。

- 在2002年在車臣的選舉期間，連表面上的合法性都不去遵守了。

需要在這裏著重指出的，西方不但支持葉利欽的政變，而且認為1996年和2000年的總統選舉的結果都

是合法的。如果西方某些領導人現在對民主的前途表示關心，這完全是虛偽的。至於最近這一次的選舉，沒有一個政府質疑普京政權的合法性，而普京的經濟和外交政策都被西方判斷為令人滿意的。

真正沒有新的事情發生嗎？真正沒有，因為這個國家正在逐步加強它對社會的控制。但是，這是否已經是一個質的變化，仍是一個疑問。“公民社會”（指群眾，但是也指有產階級〔possessing class〕）是如此的弱以致很難作出判斷。從俄國歷史的角度來看，它的公民目前享有廣大的自由。問題是，他們沒有利用這些自由來抵抗這個廣受歡迎的政權，也沒有利用這些自由使大家看出後者原來是建基在非常薄弱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它的日漸增大的威權主義，就是為了要補償這個弱點。俄國的悲劇就是，人民抵抗的力量仍是弱於國家反對這個抵抗力量的力量。

那個情況可以改變，或許會很快。但是就目前而言，這個局勢是非常穩定的。

〔註〕大衛·塞波（David Seppo）是俄國一位工會指導者。

〔譯自2004年5/6月份（總第359期）《國際觀點》〕

在這樣的狀況下，日本政府仍然維持49030億日元的軍事支出，配合從“專守防衛”向海外派兵和協助美國“先發動攻擊”的政策轉換。從“中期防衛”到空中加油機、直升機母艦等新裝備，都以此軍事預算為基礎。另外，日本的原子能開發利用，治安鎮壓體制（包括入國管理）的加強，都反映在軍事預算中。

另一個巨額支出的領域是公共建設投資：東京、大阪、名古屋的高速公路擴建，大都市機場的擴張，以及新幹綫更新等費用高達86,140億日元，至今沒有吸取“泡沫經濟”的教訓，為官僚、財團利益服務。

與此同時，在事關民衆生活的公共服務、失業救濟、農業補助、教育等方面，却連續被壓縮、削減。與此預算案呼應，執政黨的04年度“稅制改革大綱”中準備用三年時間提高消費稅。日本經團聯早已不耐煩地推動政府盡早把消費稅提高到10%以上，其會長奧田甚至建議取消企業的社會保障負擔，而讓職工全額自己負擔，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總之，2004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反映了財政破綻下的日本政府在 globalization 戰爭的反動中，朝着軍國主義和國家強權邁進的本質，必須阻止它在下一次國會審議中通過。

（趙京譯自《橋樑》周刊2004年2月9日號）

評日本政府2004年度 財政預算案

遠山裕樹

一月三十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公明黨）在衆議院支援“伊拉克復興特別委員會”和“預算委員會”強行通過伊拉克派兵法案和2003年度（從03年4月1日到04年3月31日）預算修正案，並於31日由執政黨單獨投票通過。這兩個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追加1188億日元的對伊拉克占領費用。

在04年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支出方面包括476,320億日元普通支出，164,935億日元地方政府支出，和還債用的175,685億日元國債費，而收入方面只有455,209億日元。為此，只得又發行365,900億日元新國債。這是規模最大的發行額，將使04年度末政府的首期債務總額達到719萬億日元，是國內總產值GDP的143.6%。04年預算案中，國債額竟然高達44.6%，可見日本政府放出的債務雪球已經越滾越大，日本政府瀕近破產之日相去不遠了。

抗議日本政府長期拘留 外國人的不當行為

北野

十月十三日傍晚，約有四十個民間團體的七百五十人在日本法務省前圍成人輪，把法務省大樓幾乎完全包圍，抗議日本政府長期不當拘留外國人，要求保障1435名被無罪“收容”的外國人。除了當事外國人的親身訴求外，國會議員福島瑞穗、嘉納昌吉也到場致詞。被拘留在東日本入國管理中心（茨城）、東京入國管理所，西日本入國管理中心等處的外國人也通過二十四小時絕食，連名抗議等形式配合這次行動。

在美日的“對恐怖主義戰爭”借口下，在日本的外國勞動移民面對越來越嚴酷的壓力。日本政府去年公佈了“五年內減少一半非法在留者”，通過入國管理局的網站公開鼓勵日本人提供“非法在留者”的情報，加劇了強制遣送外國人的行動。

抗議團體向法務大臣提出下列要求：1、不得拘留無罪的外國人，特別是難民申請者及其家屬、兒

童、老人、孕婦、病患者等。縮短拘留期間。2、盡可能批准難民及其家屬、兒童、老人、病患者等等的居留資格，特別要廢除“難民鎖國”的政策，展開停止政治迫害的和平外交。3、制定並實施多民族、多文化共生社會的政策。

(趙京譯自新時代社《橋樑》2004年10月25日第1851號)

宜野灣市市民集會抗議 美軍直升機事件

趙京譯

九月十二日，宜野灣市三萬市民集會，抗議美軍直升機墜落事件，決議以下聲明發送到美日政府的總統、首相以下各部門。

2004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左右，美軍海軍陸戰隊的CH-53D型直升機墜落到沖繩國際大學主建築上。這是各種美軍直升機事故中最惡劣的事件，我們表示強烈的抗議。

更不能容忍的是，美軍以“在日美軍地位協定”為理由，牽強附會地自我解釋，把沖繩國際大學、宜野灣市、沖繩縣相關機構的日本方面的搜查、調查排除在外，使大學和當地住民沒法了解事故的原因與真相。這種在美軍基地設施以外的日本領土上日本不能行使主權的異常事態，是對主權國家日本法治的侵害。在市民的強烈抗議之下，駐沖繩美軍第四軍聯絡官不得不聲明“在事故原因調查清楚以前停止訓練”，但沒想到美軍在八月二十二日又開始同型直升飛機的訓練了！這不是對宜野灣沖繩市民的侮辱嗎？

在宜野灣市的普天間軍用機場已經超過歸還期限七年了，可以想象這個機場設施的陳舊。這次事件更提醒美、日兩國政府，馬上停止直升飛機的訓練，把機場還給沖繩，並進一步徹底修改在日美軍地位協定。

(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4年9月20日號)

現代日本社會急劇增長的高齡犯罪

趙京譯

五月三十一日NHK電視台播放了“急劇增長的高齡犯罪”特集，報道在尾道市的高齡監獄情況。監獄已經滿額，平均年齡七十四歲，走廊裡排放着輪椅、步行器等。有人還需要護理，每天早上還要發藥袋。當然，監獄裡的犯人們必須每天工作六個小時，這對高齡者並非易事。

監獄中有許多人是六十五歲退休後的初犯，有80%以上是重複犯罪，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出獄後一年內再入獄。例如，有一對七十三歲的夫婦，因為沒有生活來源，去夜間小店偷東西被抓獲。有一個單身心臟病患者，因為護理的人不肯繼續護理而發生口角並打傷護理人員。一個從北海道剛出獄的老人，到唯一的親戚（弟弟）家中被拒絕後，身無分文到餐廳裡大吃大喝一頓，讓餐廳的人叫來警察再把他送回監獄。

一位八十三歲的老人出獄時，照例接受監獄長的鼓勵，“恭喜你獲得自由，從今以後，要找到正當的工作，自食其力。”對於沒有親戚幫助的八十三歲老人，到哪裡找僱用他的僱主？他們要租房子時，沒有保證金是不可能的。他們要接受生活保護，沒有住房也不可能。他們已經被這個社會拋棄了。

為什麼日本比別的工業發達國家多出許多倍高齡犯罪呢？日本社會的高齡化當然是一個背景，但日本的社會保障却是直接的原因。

日本的年金制度要求交納四十年的保險，方能領到每月六萬日元的國民年金。領取年金的最低資格是交納二十五年的保險，如果差了一個月，就領不到分文年金。目前有八百九十萬人只靠領取年金生活，佔高齡者的59.6%，其中近半數的人只領到三萬日元。如果要付房租的話，每月三萬日元是無法生存的。日本憲法保障的“最低限度的健康、文化生活權利”到哪裡去了？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日本的年金制度本身不但沒有得到加強、改善，反而趨於崩潰（連多數國會議員也不交納年金保險）的現實，日本貧困的社會保障更體現出現代日本社會的危機。正是因為在退休後的生活前景沒有保障，日本高齡層的自殺、過勞死也急劇增加。小泉的所謂“自己負責”口號下的年金制度進一步惡化，正在把高齡者們推向監獄。

(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4年6月7日第1832號)

南美洲的新反抗

哈爾文

切·格瓦拉（港譯：哲古華拉）遇害近四十年来，一個醞釀着的新反抗開始在整個南美洲擴展開來。在三年之內，厄瓜多爾、阿根廷和玻利維亞三個政府被自發的起義趕下台。在秘魯，繼近似獨裁的福吉摩里下台而上任的托雷多政府已為經常發生的反對其經濟政策的叛亂所動搖。在巴西，盧拉當選之後，才過去20個月，對他的勞工黨政府政策的不滿促使新的左派成長。在委內瑞拉，在兩次企圖推翻查韋斯政府失敗之後，全國緊張的兩極政治分化，在即將到來的幾星期裡很可能達到頂點。

這一新社會動盪不安已有四年之久。20年前是南美洲大多數左派最痛苦的時期。一連串的軍事政變使工人運動大傷元氣——1964年在巴西，1973年在烏拉圭和智利，1976年在阿根廷，1980年在玻利維亞，而在80年代期間恢復了民法才得到一點改善。這時的工人鬥爭都是防衛性的，諸如因經濟危機、工業改組使他們遭受損失。當40年周期性的經濟增長，由於巨大的債務危機而結束，這就是常說的所謂“失去的年代”。

90年代也不好過。統治階級和他們的顧問無論那裡都得到結論，即：要使“發展”獲得活力，唯一的可能就是取消政府干預的舊政策，而代之以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當他們實行私有化、撤除管制、取消福利項目，外國資本便大量湧進來，盡可能收購已經私有化的部門。而本國資本却大量流出，存入外國銀行去，以求得安全，或者到外國的證券交易所去追求利潤。與此同時，甚至在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襲擊到南美洲、引起另一輪不景氣之前，工業的改組便裁撤了大批的工人。當政府一意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一套貨色，而人民的廣大部份發現貧困的生活水平一直下降，這樣，一個新的不滿在社會的底層不知不覺開始發展起來。

厄瓜多爾

2001年，人民的不滿第一次在厄瓜多爾爆發了。

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運動（*Pachakutik*）組織了成千上萬的群眾，集合到首都基多（*Quito*）。守衛政府大樓的士兵沒有驅趕他們，却讓他們進入政府大樓。總統詹梅爾·馬哈達逃走了。一個名叫羅西奧·戈鐵雷斯的軍官和本地人運動的領導人及一位高等法院法官一起組成了革命的權力集團政務會。

群眾起義是對經濟政策使大部份居民日益貧困化的反應。生產萎縮比前一年減少7%以上。通貨膨脹猛升60%。馬哈達是哈佛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却推行更加緊縮的措施，關鍵的主要點在於政府計劃以美元代替本國貨幣蘇克里。

群眾的起義沒維持多久，在一小時內，軍方首腦即取代政務會，在馬哈達副總統之下，安排另一個新自由主義者戈斯達沃·努波亞組成新政府。

接下來的三年間，抗議活動不斷，在2001年2月間，還發生了近似起義的武裝沖突，反反復復的罷工和設置路障，一直延續至2002年年底，新自由主義在總統競選中敗給戈鐵雷斯領導、得到本地人聯盟支持的同盟組織。

阿根廷

2001年12月19—20日的阿根廷起義，是各不相同的集團因經濟危機的打擊一起發動的；這一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可與30年代打擊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危機相比。激進黨政府總統法·拉·魯阿凍結所有銀行帳戶和養老金，在失業人群哄搶大超市並宣佈戒嚴狀態，布宜諾斯艾利斯舊城的白領和低一等的中產階級人家都湧向市中心參加到失業工人群眾中去，包圍總統官邸，經兩天同警察的流血沖突之後——大約有30人死亡，法·拉魯·阿乘直升機逃跑了。

四個星期換了四個總統，即使18個月沒選出合法的總統，政府也得爭取時間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討價還價交納到期的債務，和堅持在首都對失業者實行鎮壓。

玻利維亞

2003年10月，當大批礦工用葛里炸藥武裝起來，聯合農民、本土組織和工人從郊區的愛爾·阿爾圖去接近首都巴拉茲中心區時，便輪到玻利維亞總統岡薩羅·桑巴茲·德·路薩達乘坐直升機逃走了。

玻利維亞第一次激動人心的起義是在2000年由科察邦巴（Cochabamba）地區自來水私有化激發起來的。一連串的抗議活動迫使由前軍事獨裁者總統班澤爾（Benzer）領導的政府取消了私有化。由此起三年中，一次又一次鬥爭浪潮封鎖了道路，把國家的大行政區關閉了。2003年2月間發生了近似的起義，這是由政府增加和削減稅收引發了首都一系列對抗，包括警察罷工，焚毀政府大樓及同軍警衝突，造成33人死亡。政府撤銷了稅收計劃，但仍能緊緊地掌握着政權。

八個月後，全國抗議經由智利出口原油的政府計劃的起義取得勝利。由於政府的軍警殺死更多的抗議者，結果引來了三年來所有的抗議者匯合成聯合一致的運動，這就足以把桑切斯·法·羅薩達從辦公室趕走，取代他的是他的副手，前著名電視界名人卡洛斯·梅薩。

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還沒有出現反對現政府的起義。但它曾有過兩次自認為支持現政府的貧民起義的經歷。第一次是2002年4月，貧民走上首都卡拉卡斯的街頭，迫使主要是向胡戈·查韋斯總統獲得權力的人放棄了軍事政變。第二次是在8個月之後，來自下層（城市貧民和工人組織）情緒激動不安的增長，擊退了僱主的所謂“罷工”（實際上就是關廠）。

推翻查韋斯的企圖促使大部份工人和城市貧民激進化。查韋斯在1998年競選總統勝利是靠引導群眾的敵對情緒來支持現行的政治體制。他發起的運動並沒有反對資本主義之意，或者基於階級感情的號召，寧可說他體現在新體制中的主要要求，乃係資產階級國會議員常愛玩弄的純粹形式。但查韋斯開始推行些少，有利於貧民和改組國家石油公司（拉丁美洲最大的多國公司）的管理，試圖制止它的利潤川流不息流入社會精英的口袋時，上層社會的人便震怒了。即使

這樣，第一次試圖推翻他時，那一直在屬於舊政權機構的腐敗工會領導者影響之下的許多工人却站在一旁觀望着事態的發展。

上層社會對查韋斯猛烈抨擊使事情在改變。查韋斯對那些陰謀反對他的人十分寬容（在查韋斯憲法體制下的最高法院決定釋放軍事密謀者，允許報紙和私人電視台有關政府的事情無休止地撒謊，把加拉加斯首都警察保留在上層社會反動者的手中，可以隨時襲擊查韋斯的支持者，允許大量的委內瑞拉的原油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不斷地流向美國）。而工人群眾的大多數察覺到：不受有關民主、愛國主義和有關國家締造者西蒙·玻利瓦爾的遺產的話說得再多，階級鬥爭的發展要發生的事終歸是要發生的。

這就何以國家的富人一再想擺脫查韋斯。至於他會成為什麼樣的人物，以後會由投票來決定。

巴西

在南美洲，巴西顯然是最大、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它的發展速度有四種情況十分不同。20個月前的選舉產生的勞工黨政府表明它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進攻的。但這祇是選舉時的反對，而不是扎根於新近的鬥爭——除了曾試圖占領大莊園的無地工人運動之外。

勞工黨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聖保羅市ABC區富於戰鬥性的鋼鐵工人。但作為多年來的議會的反對派，黨的領導祇習慣於充當舊獨裁政權的平民繼承人。所以，盧拉簽署了由卸任的卡多索政府在他2002年當選之前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的合約，和在上台執政伊始便推行削減社會福利（這是勞工黨作為反對黨時曾反對過的）。這就引起了抗議示威和罷工，驅逐四個勞工黨左派的議會雄辯家，和新社會主義者及自由黨人的攻擊）。

新改良主義

起義不等於革命，雖然能夠為革命準備舞台。群眾參加起義是對現存制度表象的敵視採取的行動。這同認識到推翻整個現制度的必要，或者有推翻現制度的信心並付之行動的革命不是同一東西。

由此可知，甚至在起義可能導致革命局勢時，在由起義革命的間歇期間，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改良主義

突然出現。而在隨着來到的階段，某個克倫斯基並不一定給某個列寧讓路。

新的多樣化的改良主義是南美洲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起義。而革命力量在現時還未形成的情況下出現的。

阿根廷的基爾希納（Kirchner 德國表現主義畫家），來自貝隆主義黨。這個黨十年前便接受新自由主義，那時的總統是梅寧。而現在，他認為要穩定阿根廷，政治上的方法就是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爭得更多的優惠條件，對工會官僚要多加安撫，對左派要作出表示（如豁免在獨裁政權下參與謀殺的軍官），和收買少數不滿的失業者（用“就業計劃”提供失業救濟金，由貝隆主義的機構和 *Piquetero* 組織來分配）。這樣的一些主意使他熱情十足在去年的選舉中獲得成功，得到若干最無主見的左派的一些支持。

在玻利維亞，梅薩也走了一條相似的路。他的政府對近四年來抗議運動中的關鍵人物莫拉萊斯暢開大門。莫拉萊斯是古柯樹種植者運動的領導人（古柯樹葉可提取可卡因）。他假意同梅薩合作，却宣稱任何可能選擇都會激發美國的軍事干涉。

在巴西，盧拉自從通過投票箱的群眾選票，而不是通過街道的鬥爭取得權力之後，他受到來自下層的壓力是較少的。他的“左派”面孔主要是試圖使更多的帝國主義重視巴西企業的利益來打扮的（他為巴西的農貿資本家打開出口市場），但一直在爭取工會官僚支持和重要的無地工人運動對他的信任。

在厄瓜多爾，當戈鐵雷斯在去年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協議，他的許多支持者對他很快感到失望。本土人的團體同政府斷絕關係，現正在各組織中試圖從下面恢復群眾活動。

查韋斯似乎在許多方面同其他拉丁美洲的左派有所不同。他一開始就進行改革，而不是來自下層群眾運動的壓力才進行的。但他的主要企圖仍然是改良主義的。這在他一年前贊揚盧拉為所有拉美國家指示了出路，便表現出來了。

在戰略上，群眾運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它在總的戰略中祇是一種強制的形式，而總的戰略是基於從組織上逐步改變委內瑞拉社會。這主要地有賴於調

整政府各機構，尤其是武裝力量，辭退一些老年官員，把其他一些人調換職位，這才可以防止任何政變。而查韋斯的管理一直依賴政府部門管事的官員，這些人雖不反對稍許的改革，但他們不會忍受大規模的革命。查韋斯反對帝國主義和富人的長篇講話，總伴隨着對他們表示安撫，似乎政府的未來要依靠這些人到投票箱上去投上贊成票一樣。

走向革命嗎？

起義未曾引導到革命。但參與起義的人尚未遭到決定性的失敗。新改良主義祇限於對群眾作承諾，而不是依靠全力以赴的進行對抗，雖然當今的世界體制加於弱小國家的壓力，是一定會引起對抗的。

債務問題就是最明顯的問題。新改良主義者被兩種不同的壓力夾纏住了：一方面，本國的統治階級堅持要討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銀行，另一方面，又要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這樣做就會促成新的群眾起義。

革命左派要為新的起義作好自己的準備。四年前開始的新的起義階段，革命左派是弱的，這是70年代到80年代群眾運動失敗造成分裂和失去信心的結果。現在有傾向於革命的廣大群眾，革命左派中許多零散的組織在玻利維亞科博（COB）工會的積極份子中，在阿根廷 *Piqueteros* 運動中，在新委內瑞拉工會聯盟中，都有影響。但無論在那裡，革命左派尚未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和爭取到群眾擺脫新自由主義和半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

在阿根廷，工會官僚要群眾信任基爾希納，*Piqueteros* 運動內有力量的集團不懂得同僱傭工人聯結起來就會成為真正的力量。有些人走得更遠，他們為自己不願這樣做辯護，去開展“自治主義”的辯論，以為每個團體如果都管好自己的事，社會就有可能得到改變，而無需一定要同政府對抗。

安第斯人共和國（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是新的起義的關鍵國家，是由土生土長的不講西班牙語的本地人推動的，他們佔人口的一半以上。他們在三個世紀長的殖民統治時期，實際上變成了奴隸。而在獨立後近兩個世紀中則被當成二等公民，和受羞辱喪失尊嚴的人。他們的運動就像上世紀60年代美國黑

人的運動，或者如同今天印度的Dalits人一樣，是爭取人的尊嚴和獲得承認，及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也是關於經濟的運動。這些運動很容易轉向敵對行動，不僅指向講西班牙語的統治階級和政治機構，也會指向講西班牙語的工人和城市貧民。然而他們正在擊退新自由主義的進攻。革命左派要學會把本地原住民反對壓迫的運動視為自己的運動（這一點，在過去常常做得不夠）。同時要認識到，為了使運動團結一致成為革命化的組織，他們是不可缺少的。

在委內瑞拉，群眾運動中的積極份子，對查韋斯存有很大幻想。這是因為他控制的改革挫敗過資產階級和右派的進攻。這些幻想會阻碍運動的獨立行動。

他一再通過現行的政府機構博得資產階級的歡心。所有關於“玻利維亞革命”的講話都是夸夸其談，這裡並無革命發生。資產階級一直抱有對群眾運動進行報復的希望。群眾運動挫敗過他們至少有兩次尋求極右政府和鄰國哥倫比亞的兇惡的私家半軍事組織的幫助。

要知道，南美事態的發展速度，各國是極不相同的。我估計，在玻利維亞、阿根廷和委內瑞拉，事態的發展要比巴西和烏拉圭快得多。正確地說，在數十年來，革命家第一次有機會去扮演角色了。

蔚然譯自《社會主義評論》04年7、8月號

第四國際對當今世界的評判

（詳細摘錄）

軒傳樹

【以下的文章，原刊於04年7月22日的上海《社會科學報》。作者扼要地向中國讀者敘述了第四國際2003年世界大會主要文件對當今世界的評判意見，因而以新的事實反証了：第四國際並不是像過去斯大林及其追隨者所污蔑那樣的出賣世界工人階級利益的帝國主義走狗。本刊現特盡量詳細地介紹該文原文，以供讀者研究。由於原件影印不清晰，作者姓軒抑姓靳，仍存有疑問。——編者。】

第四國際作為一個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組織，自托洛茨基等人於1938年成立以來，一貫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斯大林官僚主義的立場，主張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儘管這個小宗派影響始終很小，但近年來第四國際世界大會通過的決議和其重要理論家發表的言論，在左翼學者當中引發了不少評論與反響。它既包含着對當今世界形勢發展的分析 and 判斷，也夾雜着對現實社會主義尤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詆毀和攻擊。

矛盾深化必將打開國際政治的新組合

第四國際第15次大會（2003年）召開以來，世界形

勢呈現出新的特點，即全球化運動和一系列國家內社會抵抗運動的不斷增長，世界總體形勢可謂是戰爭、社會不穩定和多種矛盾的並存。

在他們看來，統治階級無法穩定新的世界秩序，資本主義全球化正在產生多種新的矛盾。放眼世界，伊拉克戰爭再次証實了世界局勢的無序性；前東歐集團的一些國家，新自由化攻勢和新市場的開放，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持續增長；……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世界不發達地區的不平等正在加劇。他們在一系列會議中散佈了一種看法，認為最近10年美國發動了一系列戰爭，目的都為了鞏固美國的霸權主義地位。同時，這些戰爭表明了美國經濟機制的變化，即石油多國化、軍事工業綜合發展、軍備競爭的重新發動、軍事預算的爆炸性增長，表明了美帝國主義侵略性的戰略導向。所有這些行動的國際性目標，在於美國要以政治、軍事戰略來統治全世界，包括支配其它的帝國主義列強和對全球資源特別是石油的控制。……諸多矛盾的相互結合已經導致了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和觀念上的危機。他們認為，為了保持新自由化政策的目標，帝國主義對工人運動的攻勢必然加劇。如果這些矛盾深化下去，必將打開國際政治的新組合。

反全球化運動將是發動新工人運動的切入點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國際矛盾，在相當範圍內已引起了社會和政治的反響，這不僅表現在工資勞動者的總動員上，如1995年冬天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總罷工，以及一系列拉美國家的鬥爭和反抗；也表現在反戰運動的總動員上，這在英、美等國表現得更為突出。反全球化運動體現了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演化。運動的擴展特別是年輕人的激烈化，表明了反抗的潛在能量。這是重新發動新工人運動重要的切入點。然而，現實的這些變化並沒有改變近20年來的總體趨勢，即新自由化繼續處於攻勢，而整體的工資勞動者却處於守勢，主要表現在私有化的進一步擴大，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傷亡人數的繼續增加，工人階級的不斷分散，稅務政策日益向富有階級傾斜，工資的壓力以及工人階級購買力的下降、企業破產和成千上萬勞動力的剩餘等。

代表大會指出，今天工人運動正處於歷史性的過渡時期，其特點是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自由化的結束，以及新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出現。當今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正與資本主義的新自由化相適應，日益與資本機制的上層成為一體，逐漸融合到社會自由主義中去，從而使一些平民階級從傳統的左派中分離出去，在一些國家，原本占優勢的共產黨現在或崩潰瓦解、或改建、或與其他政黨結盟。同時，在巴西和委內瑞拉等國，在反全球化運動內部都可以看到激進的新改良主義的出現。因此，目前世界整體的工人運動，仍然要為上世紀的受挫，特別是斯大林主義造成的災害付出巨大代價，新的革命前景的到來，仍然需要時間。

他們為當前國際制定的方針是，鼓勵對話和聯合行動，迎接超越雙重死胡同的新思潮，並選擇一條統一的、民主的、反資本主義的道路。國際的任務是，設法對這些社會和政治中心地區的反全球化、反戰等新社會運動的能動力進行分析和綜合說明。國際的政治路線是，建立更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並重建工會和協會等組織，充分參與各民族和社會運動的重建工作，形成民主的、社會的反資本主義行動綱領。在他們看來，儘管目前還很難預設未來一個時期奪取政權的切實可行步驟，但起碼可以根據反全球化運動的經驗，提出一系列戰略性和綱領性的問題。

反對由官僚層領導的、盜用社會主義名義的各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

在反全球化的同時，堅決反對“由官僚層領導的、盜用社會主義名義的各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其造成的各種後果。”這是他們強調的另一核心問題。正是為了實施這些要求和原則，國際才繼續提出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向東歐、前蘇聯和中國的擴張，反對所謂“社會主義官僚政權”造成社會福利惡化、生產資料商品化和普遍私有化、對工人剝削增加的各種政策。同時，國際不但拒絕對一黨獨裁制的懷舊，也拒絕在權力層的控制下對社會福利的虛偽保護。因為這些權力層往往以反對全球化為幌子來保護它們自己的特權及與工人的壓迫關係。

第四國際認為，在與一切正在進行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鬥爭取得聯繫的同時，應反對任何對社會福利和權利的侵犯，並無條件地支持反對社會退步的各種抵抗運動。他們認為，有些國家以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以假現代化為幌子，向世貿組織制定的規則打開門戶，事實上意味着對工人階級的超級剝削，即以最低的成本為世界市場進行生產，同時使該國的新資產階級致富。國際對這類國家提出了兩點所謂指導性的意見，即對現在仍以工人名義執政，但實際上在犧牲他們利益的各個政權，進行徹底的批判性分析，在從未真正實施過的民主的基礎上，與一切反壓迫的鬥爭進行聯合，使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計劃重新建立起來。

（詳細摘錄自2004年7月22日的上海《社會科學報》）



第四國際章程序言

(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會通過)

蔚然 譯

1、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第四國際，是由接受和實行它的原則和綱領的支部和戰鬥員組成。在不同國家組成的支部聯合成單一的世界組織，在主要的政治問題上共同行動，而在尊重民主規則下進行自由討論。

2、第四國際的目的是幫助無產階級和受帝國主義剝削的各國其他階級提高政治意識的覺悟和組織起來，以便消除資本主義的壓迫、匱乏、不安全、戰爭和殺戮。第四國際尋求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的原則是：工人階級和所有的被壓迫被剝削者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提高無產階級和受帝國主義剝削的其他階級的政治覺醒和組織起來，乃是達到無階級社會的第一步，志在確保民主的計劃經濟、持久和平、社會平等、保護生態環境、反對一切壓迫和確保人類團結。

3、第四國際把人類的先進社會經驗總結在它的綱領中。第四國際牢記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從巴黎公社、俄國1917年10月革命、第三國際最初的四次大會、左派反對派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1938年成立大會通過的過渡綱領及其後歷次大會通過的關鍵的綱領性文件等取得的經驗教訓成果，並以此作為自己的基礎。

4、第四國際在轉變的進程中，從當前的鬥爭開始，直至同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決裂，致力於如下的鬥爭：

- 爭取工資勞動者當前和過渡時期的要求。
- 爭取民主權利和大眾自由。
- 為同資本主義決裂的革命，以生產者的國家管理取代資產階級的國家而鬥爭；為在占領的國家爭取民主和民族的鬥爭轉變為反對資本主義而鬥爭。

- 爭取在社會生產資料屬於社會財產的基礎上建立民主社會主義、工人自我組織、民族自決、政黨和政府分離。
- 爭取民族的和工人階級運動在民主基礎上的群眾聯合，尊重多黨制、傾向的不同意見，和保證對資產階級與政府的獨立。
- 在鬥爭中擴大自我組織和尊重民主權利。
- 反對所有寄生的官僚主義（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工會、民族主義的……）控制群眾組織。
- 反對壓迫婦女，爭取獨立的婦女運動。
- 反對壓制同性戀者和任何形式的性壓制。
- 反對民族壓迫，尊重民族自決和民族獨立的權利。
- 反對種族歧視和各種形形色色的沙文主義。
- 反對宗教特殊論，主張宗教與國家分離。
- 反對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破壞生態環境。
- 爭取積極的國際主義和國際反對帝國主義的團結，保衛各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不許排斥、不許進行宗教主義、不要出於外交手段或功利主義的考慮提出任何要求。
- 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男女平等的、民主的積極分子的政黨。
- 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多元的、革命的國際。

5、第四國際的基本組織單元是由各國支部構成。每個國家支部志在集合所有力量，這些力量同我們一起追求共同的奮鬥目標，即：建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這個黨在國內的階級鬥爭中有能力擔當起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決定性角色。這就是說，鑒於一個國際組織不可能代替革命鬥爭中各國的領導，所以第四國際冀望通過各國支部的鬥爭才能達到它的最終解放人類的目的。

(譯自《國際觀點》第351/2期合刊)

《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建立新的國際主義》引言

祖思、羅文、沙爾瓦多，華登合撰

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於2000年11月通過決議案《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國際主義》。這篇引言曾在第十五次國際大會上提出討論及修改。如同2000年11月的決議案一樣，將作為進一步提供有關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及其發展，與一個不同的全球化的集體意見。

決議案《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國際主義》，是在抗議西雅圖世界貿易會議後寫成的。當時已經清楚全球局勢正在改變中，但對這改變的估計還是過早。現在，我們已能夠更客觀的分析這個局勢，有可能更詳細的加以闡述我們的分析，並指出這個運動復興所帶來的問題。

過去三年來，世界局勢是明顯的走向戰爭，以及從2001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在這篇引言裡，我們祇限於主要分析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所得到的實際經驗。但首先必須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本身的演變。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矛盾

2000年11月的決議案指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影響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軍事等領域，急切需要一個新的統治方式。這一個過程尚未完成，而且也永遠不可能完成，因為它本身充滿了各種矛盾。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一開始，其軍事目的已經全部暴露，在更廣泛的程度上較之2000年11月決議案起草時尤甚。因而反對戰爭的活動，已變成為中心的及真正國際性的，在程度上也是三年前所沒有的鬥爭。

同樣地，對伊拉克戰爭的準備中，也顯現了帝國主義間尖銳的矛盾，與全球化過程這方面所出現的相同，在某種程度上比西雅圖抗議時期更為加深。

向社會殘暴進攻(新自由主義政策)及軍事進攻

(“先發制人戰爭”理論)，是資產階級在全球化結構之上發動國際層面的攻勢，其烈度，我們不能過高評估。但我們理解，十分普遍和激烈的全球化，都將會引發抵抗的生長；而且傾向於聯合各種不同形式的抵抗，已經証實了。同時，資本主義全球化本身，已經造成了統治階級間的重大矛盾。

改變目前的幅度問題

各方面的因素允許我們下結論，就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世界性的激進時期，它不僅在規模上，且其有關情況也完全可比美1960及70年代的激進化時期，儘管歷史條件不相同。

這次激進化的國際性是第一個特徵。如同資本主義自1850至1880年間，第一次全球化一樣，曾經促進工人運動興起的國際化。目前的國際化也源自現在發展中的激進抗議運動，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最受影響的國家，而且從一開始便建基於國際的平面上，超越了它們的國家與洲際的區別。這些運動已經造成了一個互相增援的強大力量，從西雅圖至布爾諾斯艾利斯，及從佛羅倫薩至阿雷格里港，都發展成了一個“世界運動”，成為一個建立新力量關係的(包括在國內力量關係的)重要力量。

這些運動的第二個特徵，就是能夠和新的政治問題結合。起先是集中在對整個全球化的譴責，特別是對執行全球化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世界貿易組織)，運動很快且容易提出到社會及環保的問題，成為了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層反對派。

對9·11事件爆發後戰爭的反應，並不是很明確，但運動很快便與反戰及反軍國主義的鬥爭結合。連接着1980年代產生的和平運動。有些國家還積極參與支援巴爾幹及巴勒斯坦的團結活動。

最後和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這些運動的

擴張，千百萬的人參加社會論壇，及為抗議而組織起來的示威遊行，因而更提高了社會與戰鬥的水平。西雅圖發生的抗議，各著名大學的學生佔了參加示威的重要部份。這也指出了運動的力量。它不僅是抵抗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侵害；且還指出這制度內部的深廣的危機，導致不少進步的學生，如同在1960及1970年代中一樣，激進地提出對這制度的疑問。但很快這運動便擴大了，在不同程度上，達到農民運動、婦女運動、整個工會運動及大多數非官方組織都捲入這過程，參加他們廣大的社會論壇。這種情形和1950至70年代是不同的。那時期的工會會員數量雖然強大，但由於戰後逐漸獲得的成果而呈現消極，他們反對當時興起的向“消費社會”挑戰的抗議運動。但是今天，工人運動自80年代削弱以來，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演變，也開始參加這些社會聯盟，儘管仍然存在各個別組織的不同。

新的“創建歷史的經驗”

概括來說，祇在幾年期間，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動，已經驗到一個很特別的數量增長(在這方面，熱那亞是質量的轉捩點)，可觀的在不同地區的發展(雖然這些增長是不平衡的)，和很明顯的及主要的社會目標的擴張。所有這些，都必須克服無數的障礙及困難：運動必須要融合自己身邊的新成員，並忍受壓迫(如在哥德堡、熱那亞及其他各地)，像被指控為罪犯(自9·11以後)。同時，將他們吸收到自己的一邊來。另一不同的全球化運動亦很快的擴張，且迅速激進化，逐漸積累的演變過程，從而開始引起人們考慮：經驗的集體化，覺悟水平的提高，不同建議的連系，要造成與前時期的真實突破。

我們不能夠預測這運動的前途，及其足以克服以後所面對新困難的能力。但我們能夠觀察到經已發生的事實。很清楚地看到，作為一個不同的全球化運動是有深固的根源的，它反映目前國際激進化的高漲，它是剛開始從今天的抵抗運動表達出來，並提出作為代替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制度。

就是在這意義上，我們所討論的，正是人們稱之為一個“創建運動”，或一個“創建歷史經驗”。這樣一般政治經驗的構成，推動新一代活動份子的集

體覺悟，這並不是說，“新的”(全球化運動)是代替“舊的”(傳統工人運動)，兩者之間的連系仍然是主要的關鍵。但這就意味著展開一個不同的全球化運動是基礎。從這基礎上，我們可以意識及想像到甚麼是新的。理論上、行動上及組織上，我們的政治工作達到在質量上更高的水平。與1970年代不同的是，我們能夠從目前的情況下更新我們的思想，及分析目前激進化浪潮的根源(包括活動份子的覺悟程度，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歐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地的局勢差異等等)。

新的國際環境中的運動

喬治布殊當選總統，及跟隨9月11日的襲擊，已改變了鬥爭的場面。加緊壓迫措施，軍事預算增加及干涉同時進行。今天更甚於昨日的軍國主義與戰爭，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本組成部份：今天美國推動戰爭，同時通過武器的購買，加強了經濟的上升，控制有戰略性的產油區，及重申美國支配世界事務的意向。

軍事化的加強及戰爭的威脅，這就是在國際平面上整個反帝國主義統治鬥爭的一部份。共和黨政府保衛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比之以前的更懷疑和悲觀的犬儒主義。例如對鋼鐵進口採取關稅保護措施，放棄京都協定，及拒絕接受任何世貿協議條款，允許南方國家生產或購買非專利醫藥品，都是最近表現的例子。像這樣單方面的控制，將更削弱國際機構(它們被期望服從美國的要求)，增添了與其他控制國家緊張的局勢，並激發起該制度的擁護者間的反對，包括像Stiglitz聲明所表明出來的立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鎮壓的危險將會增加。但同時也將給與激進份子運動一些機會，它們可能在各國間存在的矛盾及分歧中，較易於阻止某些決策及機構的措施。這樣的條件將造成抵抗運動的統一，及減少由談判造成的運動的分化。由此整個聯合運動和許多非官方組織，將會加入目前地方或全球性的、激進份子召開的社會論壇。

社會論壇及社會運動的協調架構

社會論壇，不管在洲際內或全世界上，是反對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力量主要召集的會議。它們的成功有賴於，當他們所處的許多國家中的政黨正面臨合法立場的危機時，保持坦率公開的態度，及特別著重社會運動的立場。論壇公開舉行，參加的人除了同意遵守憲章原則，很顯明是要包括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原則。

這種坦率公開的態度，和不作任何承諾的保證，就是能做成這樣廣大的戰士集會的成功，但同時也表現出集會的限度。因此，這樣的社會論壇沒有作出任何行動的決議。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社會及活動份子的運動，自從2001年第一次社會論壇以來，便有接觸會談去展開“社會運動聲明”，使他們能夠在2001及2002年間對近年來的重要事件採取共同的立場，特別是對行將到來的國際高峰會議，取得共同的政策反對戰爭，動員群眾反對八強(G8)會議，贊成取消第三世界負債，反對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會談。在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時，社會運動曾集會討論這樣一個組織網成立的可能性，以作更有效的行動。目前局勢很清楚的指出，需要有一個公開機構，如社會論壇所容許的，一個注重行動和國際運動的工作機構。

社會論壇配合運動協調的架構是如此成功，因為它與目前活動份子的覺悟性相一致，而且在每一階段鬥爭，配合某些正確的防守方面(連結“保護”空間所佔位置的形式)，和進攻方面(堅持還有另外的選擇及為求另一世界的意志)，這樣的聯合是可能造成“事件”(論壇本身在其高潮時期和“我們同盟者之間”罕有機會的集合)，以及積聚鬥爭及動員“過程”的配合。

運動及其政治前景

我們所見到國際上鬥爭的新階段，允許我們提到政治問題。但目前的形勢是和1960年代及70年代或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革命運動完全不同。

運動的激進化與生長是同時的。在起始的階段，多數的這些運動，祇是堅持打擊新自由主義。今天，運動已經在社會問題中成長及生根，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發生新的危機，暴露如安隆集團崩潰的醜聞，從其運作及其必然產生的結果，使運動很清楚表現出

反資本主義的特徵。通過保衛人類“一般遺產”：水源、公衆服務等去反對市場經濟，或對教育的爭論，可以表現出兩種相反的思想與制度的衝突。這激進化過程已經在選舉及政治方面產生影響：使許多國家的政黨都與社會運動聯繫起來；使革命的力量近年得到顯著的進展。

關於一些戰略性問題(革命問題或者不同地區的鬥爭已達到革命與改變社會相結合)，展開一個不同的全球化運動，已經使我們能夠在新的歷史經驗基礎上，去重新考慮我們的思想。但這激進化仍不能重新引起其他一些戰略性問題的討論。如我們所見到的“反資本主義覺悟”的復生，政權問題及奪取政權的方法，仍然是在這些運動討論範圍之外的。為何如此，理由很清楚。這是上世紀革命失敗造成的巨大影響，使人們難以想像，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從資本主義割裂，超越國家的界限；而運動本身作用所起的效率，是依據架構內成員提出認為重要的問題，而并非從主要戰略性去考慮的。

這些弱點是不可立即解決的。然而同時又出現了另一重要問題。如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左派都在選舉獲勝。這些左派，像巴西工人黨，或厄瓜多爾的Pachakutik黨與社會運動的連系，比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更多。這些左派必須選擇，或者是市場邏輯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或者是促進社會需求的滿足。我們要重新討論，耐心地永遠將困難問題牢記。戰略的困難加上許多被隱蔽的原因，我們應該比任何時期更有自信。唯一向前的正確路線，是為爭取農民、工人及勞苦大眾利益的路線。

面對這新形勢，站在運動一方的政黨，是有很大的機會起到影響作用的。他們必須參加討論去澄清集體的觀點；但也必須採取行動，尊重運動自主權，協助鞏固進行中的激進化和支持政治的選擇。可以允許我們去爭取到這些要求。對採取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政策，積極參加運動的行動是最好的機會，進行重新改組社會及政治力量，並推進革命的事業。

2003年2月14日

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國際主義

（2003年第四國際第十五次世界大會通過）

王敬譯

導言

過去幾年來，我們已經在許多國家見證到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大，這些抵抗運動個別有很大區別，但在連續發生的國際運動展開時滙聚。當世界貿易高峰會開始“新世紀會議”時，在西雅圖的總動員，是近來最突出的一個例子。跟著是2000年其他的動員抵抗示威。這些鬥爭一般保持防守性質——抵抗全球化破壞的影響——但並沒有一個有效的全球化的政治體制出路，可以代替當前統治的制度。但這些鬥爭也有有力的進攻性的方面，就是擯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及社會秩序，而堅持新的團結形式。誠然，工人及群眾運動曾受到一連串嚴重的倒退及失敗，這些影響仍然是很明確的，而且資產階級繼續進行打擊。雖然如此，目前的局勢已相對地比以前清楚改變了。

下面的決議，基本上并非分析整個民主的、或目前群眾抵抗在國際主義範圍團結運動的鬥爭，而是針對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造成的條件，及其影響新的戰鬥性國際主義的興起所形成的障礙，與在這估計下可能提供給我們發展的機會。決議是要澄清在目前局勢下可能出現的新因素，或者在今日如何重構過去的問題，由此讓我們作更好的準備，積極進行國際主義復興的工作。由此產生的一些政治問題，包括我們的任務或我們綱領的性質，都在分析的過程中分別在各章節提出討論。最後的部份祇是簡單扼要地重提這些政治或綱領問題，而不對問題作有系統的總結性分析。

為團結而鬥爭：決定性的問題

1. 時代背景

1980年代，國際主義觀念除了在極少數活動份子的圈子之外，已大大失去影響力了。這是由於一連串不同的原因：從強大官僚國家（莫斯科、北京等）利益出發，對國際主義鬥爭的操縱；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沒有能力對第三世界的解放鬥爭所需要的團結作

有效的回應，因而這些鬥爭孤立而受到阻礙，致成為嚴重惡化的力量對比關係的首批犧牲者；同樣，北半球工人階級經歷連續退卻及失敗，懷疑社會主義有效性的信心危機，工會組織明顯衰退，等等。

在蘇聯集團瓦解後，國際主義觀念被貶到最低點。而新自由主義觀念的反攻則達到了最高峰。但過去數年來，國際主義的復興是很明顯地可察覺到的。假如這變化加深發展，就可能使團結運動重獲它的政治動力，重建一個根本的另類選擇，儘管這一復興目前仍然在早期退卻及失敗的陰影中、且還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的性質，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作用的深刻影響。

這兩個事實——前一時期遺留下來的，及目前時期的特徵——與其他問題一樣，為了瞭解推動國際主義實踐的困難，必須要全部考慮。但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它所導致的抵抗的同時，使我們認識到，今天建立一個國際主義的計劃是有很大大可能性的。

2. 國際主義傳統

國際主義前途的危機，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持續惡化至1990年代初。在這方面不祇是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的及斯大林主義的工人運動，且也包括當時激進的反資本主義傾向的影響，都很大地減少了。非官方組織以往是引人注目的活動中心，但許多已經失去原來的激進主義，變成了制度化及愈來愈依靠官方或半官方的資金支持。

與第三世界人民團結的感情仍然是活生生的因素，但已相對地變得非政治性了。由此造成落伍的觀念，讓帝國主義列強在緊急人道救援的掩蔽下去操縱。除了很少的例外，國際團結前途的抉擇已不再被清楚地、自覺地理解為是包含在改變整個社會制度的鬥爭範圍之內的。

的確，進步的運動及國際的團結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這點是必須強調的。有些動員甚至於很廣闊，

像1989年法國革命二百週年紀念時的反對第三世界負債的運動。但整個來說，這些運動已變得更局部化，和經常喪失政治的目標(特別是喪失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具有革命自覺的特徵)。這樣破碎分裂的狀況，是我們今天不管付出任何代價都一定要克服的。

前一時期遺留下來的傳統，却不是完全單方面的。斯大林主義的包袱多已被拋開了。今天，工人、民衆及革命運動比前更加清楚對民主的需要。假如社會力量關係有所改進，社會主義的主張及真正的國際主義是較容易進行的。至少我們可以著手開始在非官方組織的、有戰鬥性進步的部份所積累的豐富新經驗裡，找到重新思考的問題，例如關於發展的問題。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爭取為政治庇護權及保衛移民的鬥爭，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整代人。婦女運動能夠積極的組成在世界範圍的網絡，使她們的解放鬥爭，有適切的國際影響。同樣，今天同性戀運動也如此。最後，對生態環境危機的新觀念及對全球各地互為影響的新理解，也打開了活動的廣闊領域，激起廣大的民衆對“地球”的意識。

從現在起，上述所有方面必須成為新的國際主義的基本組成部份。

3. 全球化

從國際團結的觀點看來，成為最近期間最顯著特點的，就是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所佔的中心地位，及多類型不同形式的抵抗的滙聚。這個中心地位和多種力量的滙聚，可大致解釋是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影響的性質及所牽涉的範圍，使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層面都感到痛苦。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世界市場的重建及資本國際化的新階段。它首先表現在經濟範圍方面：財經部門自主權增長，資本運作及貿易激烈但不平衡(以南半球作犧牲)的自由化。各類型大企業的合併，競爭擴大、管制解除、私有化等等。但是，全球化不僅祇是在貿易、工業及財經方面實行。

目前正在進行之資本主義全球化加深了社會的變化：首先就是最低層階級，被置於日增的無保障及

分化、渙散的暴虐過程；其次，在統治階級本身，多個傳統的組成部份的資產階級及上層人物，也被削弱及邊緣化了。全球化正在重整北半球統治南半球的模式，促進地球空間的重新改組。不平衡地鞏固三個帝國主義組合核心的邊緣地區，和可能放棄更廣大地區讓其崩解，這是為了改造政治決策的支配機構，使整個權力中心起到新的平衡作用，不管是在經濟的、政治的或軍事的、國家的、地區的或國際的作用。如此，就賦予了戰後期間建立的世界機構有新任務。實質上，資本主義全球化需要建立一個在國際平面上和在許多國家中資產階級統治穩定的新模式。在自由貿易的名義下，新自由主義的秩序，就是要將社會生活的整個部份置於市場及跨國公司的獨裁控制內，把目前社會生活的小部份仍未受控制的部份納入其控制內。同樣，在有競爭權的名義下，將國家政策及施行範圍盡量限制，減少國家嚴格管制的條例，同時允許大跨國公司、財經及工業寡頭賣主的壟斷，有史無前例的行動及決策的自由。國家仍然繼續起重要作用——特別在世界舞台和涉及強大帝國主義國家的事務。然而新自由主義現在已大大地減輕(包括通過法律規章)資產階級依賴其正常的統治系統，及基於主要再分配機構的社會政治規則，認為是破壞了競爭權。這些統治的模式(歐洲的社會妥協，非洲的保護國，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亞洲的中央集權等等)仍然証明其用途，是允許目前的政權得以鞏固其社會根基，及打擊任何突然興起的群眾鬥爭。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地在經濟、社會、意識形態、制度、政治及文化的領域上發生基本的影響。這固然表現出在重新改組過程中的資本主義，還有強大與萬能的力量，但同樣也顯示出它主要的致命弱點：它的每一擴張，客觀上都造成了全世界各種形式的抵抗，且由於共同命運，在進行中的各戰鬥領域之間已促進前所未有的連系。

4. 團結一致

正式決策權愈來愈遠離民選的機構(包括在西方國家)及實際上限制重新分配政策，使新自由主義的秩

序顯出其階級獨裁的最粗暴的形式。這是它的第二個致命的弱點。在危機到來的時候，它不但不能再聲稱有選舉授權的民主合法性，也不能從減低不平等獲得社會的合法性。

和其他資產階級統治模式一樣，新自由主義秩序的穩定，是基於被剝削及受壓迫群眾的消極與分化(因而是無權)，這就說明了它的意識形態攻勢，為什麼暴力地宣稱沒有另外的出路，沒有希望可以改變現制度。這也說明它的對社會攻勢為什麼如此粗暴，目的不僅要保證持有產權者從剝削剩餘勞動取得利潤，而且要阻止新形式團結的組成，及瓦解舊形式的團結(特別包括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安全和社會保障制度)，這種措施是以現代化的名義為藉口的。於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便將整個社會結構分裂，使得低下層人民的生活更加朝不保夕。社會沒有普遍的安全，而且取消過去鬥爭所贏得的集體談判權，代替它的是不健全的所謂“安全網”；與特定的、局部的及私有形式的慈善救濟分而治之：資本家的論述是使失業者對抗僱傭勞動者，私營部門對抗公有部門，女工對抗男工，青年或移民對抗成年人或土生本地人勞工，將世界變成所有人在互相對抗的競爭中。

資本的進攻是猛烈驚人的，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也產生抗體，並直接造成新形式的團結。市場秩序企圖支配社會每一部門，由此給予社會及民主鬥爭中橫向的各部門滙聚的基礎。各地同樣的制度推行同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產生國際上的滙聚的抵抗運動的基礎。

分裂還是統一：那一方將佔優勢？取得團結一致的成功或失敗，將大大決定明天的戰鬥是否得到勝利或遭到失敗。

新的局勢

5. 動力

在前一段期間，國際間的團結一致是局部的消失了，且相對的失去了政治的目標。這是由於工會運動組織的削弱，及工人階級遭到失敗的影響所造成。但今天面對新自由主義殘暴的進攻，社會問題重新造成

抵抗的增強，比以前佔更重要的地位，包括在帝國主義國家也是如此。這並非是低估民主、文化、婦女或環保鬥爭的特別重要性；而是能夠有效的保證一般民衆各種鬥爭的根基，及策劃這些領域動員的推動力。

最近資本在世界平面的重新改組，及其首次危機(1997-1998)的影響，開啟了新領域的鬥爭(爭取環保及食物安全，反對財經投機及對市場的壟斷)，或增加其重要性(反對世貿組織)，或改變運作的環境(民族鬥爭)，與重新提出鬥爭內容(要求民主及人權)。當前最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去推動這些運動。

6. 轉折點

如果我們觀察對全球化經濟及金融體制政策的抵抗，鬥爭的動力有時期上的變遷。這些鬥爭最近在事實上(經常是1990年代後期)發展了新的面向。

取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世界負債的鬥爭，在1980年代後期曾有一段長時間的黯淡。當1999年科隆動員，2000年不還債運動(南半球2000年不還債運動是激進之一翼)，及巴西幾個省份聯合拒絕償還債務時，則突如其來地復甦。跟隨1997-98的金融危機，社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劃的抵抗，便從南韓擴展至拉丁美洲。

多年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極力將極端新自由主義的多邊投資協議分別談判；1998年僅數月，就顯示了國際農產市場(MAI)造成了北美和西歐的民主醜聞。同樣在1998年，反對金融投機及市場壟斷達到前所未有的強烈，ATTAC(徵金融交易稅援助平民協會)的基層運動，特別是在法國，所造成的政治動力有可觀的增長。

對南半球國家不公平交換的批評及要求公平的貿易，已不再祇限於激進份子的網絡。烏拉圭談判(Uruguay Round)的結果是世貿建立並沒有導致任何重大示威。五年後的西雅圖世貿會議，却激發了主要的動員(在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由此引起了國際的反響。

這些發展，見證了在一段時期新自由主義所堅持的觀念已經衰微，且由於不平等增加，市場壟斷及東方與西方、北方與南方社會模式高危的競爭，形成了

反叛的情緒。拒絕接受新自由主義計劃，首先在某些特別的國家有突出的表現——如1995年11至12月法國公營機構的罷工，或1997年1月南韓私營機構的罷工——每一個國家的鬥爭都引起了很顯著的國際回應。

最近幾年來，全球各地很快且接連地發生這類的抗爭：1996年墨西哥薩帕達游擊隊號召在恰帕斯(*Chiapas*)舉行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星際集會(*Intergalactic Gathering*)；1999年由ATTAC在法國聖但尼斯發動的國際集會；在科隆召開的2000年不還債運動紀念集會；以及最後，特別是由美國「大眾市民」及勞聯——產聯組織的西雅圖示威抗議。因此，群起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市場的壟斷，迅速明確顯示其團結一致及國際主義潛力。當然，為了塑造及充實這個國際主義復興，我們還要走長遠的路。但是這樣的動力已經在運轉，現在有可能從這基礎向前推動了。

7. 支配統治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並沒有造成一個同一的國際經濟空間。相反的，它趨於加強層級統治的特性。債務使得第三世界變成民窮財盡的國家，是首先的受害者：跨國公司在南半球基地的增長突然中斷；本國市場被迫作單方面的開放；國內農產品受到加速的破壞。第三世界更淪為次要的科技地位，和工業及財政的重新殖民地化。帝國主義的支配統治仍然繼續。

政治空間的重新改組也是同樣的真確。地域的控制及影響範圍，行政的穩定，都對過去世界力量關係對比起重要的作用。這是殖民時代傳下來的遺產，也是造成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或東西方陣營之間衝突的直接結果。隨著革命的受挫及蘇聯集團的瓦解，這種作用已失去重要性，至少，在這地球上還沒有直接融合三個佔支配的帝國主義軸心(北美，西歐及日本)的邊緣地區是如此。一些社會是可能真正的崩解，如在中非洲一樣，而國際統治階級不感到他們的利益因此受到威脅；至少在目前，私人僱傭軍多少還可以保證他們對當地資源貪欲的享用權利。

因此，目前和南半球人民團結一致的任務，比以前更為迫切，以扭轉第三世界危機往往沒有為北方人

民所感到的局面。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向將整個社會結構(包括帝國主義的中心)的破壞、邊緣化及動搖。在北半球許多人無家可歸，在南半球則沒有土地。而各地都發生失業及無證件者流落的現象。

今日仍然需要而且有可能聯合北半球與南半球，按傳統的團結組成共同的抵抗陣線。由於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展開的政策，南北兩方面都感到面對共同的命運。

8. 僱傭勞動者

工會運動面對1990年代及全球化的進攻，在每一領域——組織上、行動上及政治上——都變得很弱。除了國際貿易秘書處(*ITSer*)算是例外，工運當資本主義在每一國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工人彼此互相直接競爭時，證明沒有能力去協調國際平面的行動。除了很少的例外，在同一跨國公司組成一個工人組織——這是一項基本的任務，也是急需的——仍然停留在萌芽的甚至不存在的階段。

在這樣的條件下，資本家仍能夠在自由市場的名義下實行其反攻。工資所佔部份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是顯著的降低，增加的是屬於股東的利潤。就業權及工會組織權，包括西歐國家在內，已受到嚴重打擊。這原是受到在集體談判的協議及條例所保障的。工會的社會基層陷於混亂的狀態，這是由於工業及第三產業重新調整和正在進行的勞工組織改革造成的，其目的是促進新科技應用，其社會目標是加強階級統治。

因此，工會運動普遍面對雙重的危機：一方面，工會已大致失去代表工人對雇主及廠方談判的傳統作用(自從資本家背棄其前期重新分配政策以來便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工會的影響事實上已經減少，今日經常祇限於昔日的堡壘——一般是公共部門，或者最大的私營公司(特別是金屬工業)。

今天這問題是如此嚴重，簡單的將目前工會運動重新轉變方針是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進行重新改組，工人運動也必需跟隨作全面的改組。工會本身同時必須要國際化(最終的或者再次地國際化)；重新與工人討論對話，及確保民主地參與日常基本事務及鬥

爭；積極促進婦女的作用及其領導作用和領導地位，重新爭取對少數族裔及移民的影響；組織或協助組織臨時工及失業者；爭取在工人階級及整個社會的影響；以及真正加強為其自身的解放而鬥爭，由此重獲政治的能力，去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方向，提出全球性的出路。

至少在某些國家(如法國、美國、南韓及挪威)，在過去十年或最近幾年來，部份的工會運動與失業人民行動能力和組織已顯示重新興起。但這有希望的發展仍然是緩慢的、不平衡及局部的。面對工會官僚在國際上的行動，許多工作仍需進行，去幫助建立(特別在南方及東方)激進的、獨立的工會，及在協調機構帶來新的生命(例如歐洲勞動議會)。

為了進行全面的改革，真正的重建，克服分歧及恢復工人階級有效的鬥爭能力，工會運動必須開始特別著重其本身的深度民主化，更有系統地連結基層，與社會運動的各方面聯合一致鬥爭。

9. 農 民

農業是在最近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特別發生重大改變的一個部門，開始是綜合農業企業的發展，然後是基因改造糧食。這轉變約在30年前開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給予世界貿易組織一項主要的權力，就是執行全球的整個農業遵守新自由主義市場規則。但這一大資本的進攻正帶來強烈的抵抗，農民生存受到威脅，迫於參與社會多方面的群眾匯聚去進行抵抗。

保衛農民農業的鬥爭，很明顯地，其政治的含義在今日與過去有很大的區別，這是當前時代主要特性之一。長久以來，這問題的重要性是農民佔人口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才理解到。但即使如此，農民的抵抗往往被解釋為純粹防衛性的。現在這鬥爭普遍地是更清楚表現到：即使在多數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工業化國家，也變得極其重要；它提供了更清楚與資本主義綜合農業企業經營不同的社會的前景。

資本主義的綜合農業企業的發展，造成災害的後果，牽涉的不僅是農業的生產範圍，它影響到消費(食

物的品質)、環境(水及土壤質量)、及生態平衡(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生物圈的影響)，農村的發展(自然景觀；維持人口水平及鄉村的公共服務)、就業(農村人口因失業而大批外流)、文化(日常飲食習慣的同一化)及帝國主義統治機構(第三世界依賴食物的輸入)。

結果，農業工人或農民的組織(如巴西的MST無地農民運動、法國的農民聯盟等)，能夠重新捲入改變社會的全球性鬥爭，與僱傭勞動者的工會及其他社會運動結合一起。南方與北方農民(特別通過「全球農民組織」的成立)的戰鬥性合作已經形成。消費者的權益保障運動和農民保衛農業之間的合作，在為食物安全的共同鬥爭中，已經加強。

10. 婦 女

新自由主義統治的模式，依賴於社會運動的分裂，較多於把各運動收編在一起，它增加所有形式(階級、性別、社區，地區等等)的不平等，加劇壓迫，激起極端反動觀念的復興或加強。婦女受到了這些倒退措施的嚴重影響。

因此，婦女是首先工作沒有保障的受害者。甚至在一些國家，婦女以往直接鬥爭而獲得的工作權也被沖擊。婦女在家庭和社區中負擔的責任，也受到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另一重大打擊：有系統的社會不穩定，遠超過就業的不穩定。宗教原教旨主義在某些國家的復活(如阿富汗)，造成婦女的悲劇；但即使在世界其他各地，反動觀念也打擊婦女的尊嚴及基本權利，如公民權、選擇權及保健權(包括避孕及墮胎；南半球有些國家的婦女，在人口控制的名義下，被強迫進行絕育手術)。

婦女解放的鬥爭，因此是愈來愈迫切，仍然是整個為權利平等及改變社會鬥爭的交叉點。面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鬥爭的國際性程度是更加顯著，例如2000年婦女組織的全球遊行示威所顯示的，証明反父權統治、及反資本主義制度雙重鬥爭的深廣程度，這和組織國際婦女運動的進步是一致的。

11. 移民

流動性的移民，多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經濟的需要，及統治制度混亂(如戰爭及飢荒)的影響所決定。移民的處境在歷史上，在不同的時代有各方面的區別。新自由主義秩序製造的移民命運的象徵是特別的顯著：沒有証件的移民，沒有權利的婦女，被迫在企業被剝削剩餘勞動，或者作家庭傭工，雖然她們在本國曾受良好教育。還有甚麼比這以普遍不安定為目標的制度更有象徵標誌呢？

在其他歷史情況下的移民，不管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還能在居留的國家找到位置，以及有希望的前途。今天任何這種希望已經消失了。他們經常生活在極不穩定的情況下，繼續支持他們的家庭，失業及貧窮的威脅不斷出現；在他們原來的國家，移民的匯款是主要經濟來源，可能使危機鬆緩而避免導致不可救治的社會崩解。我們看到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以移民作人的犧牲的。

移民已經展開他們被迫要秘密生存的鬥爭，要求被承認，要求合法居留權。他們能夠號召重要的團結運動，和在許多歐洲國家獲到可觀的局部的勝利。他們已經展開了一條為尊嚴、平等及團結而共同戰鬥的新陣線。

12. 青年

青年人的將來前途，今天比他們的父母輩更加不穩定。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局勢急劇改變，及目前時期倒退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當提到就業及社會保障，這種說法就很明顯的真實；但人人均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即使在世界許多受教育的權利似乎已經確定地建立起來的國家，也漸被侵蝕。

從流動性方面來說，這情況在各國及各階層間有極大的差異。在很多情形下，青年人，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消費主義觀念、個人的競爭、電子及股票市場的“現代狀態”等意識形態征服的首批受害者。但是，仍有文藝及社會的抗拒統治的意識，顯著的是通過音樂(如Rap)。不少國家在政治上較活躍的青少年，已經發明新形式的鬥爭，例如英國的「奪回街頭權

利」，或美國的「直接行動」。

今日，青年為他們的權利及前途的鬥爭，特別是他們同代人的經驗，會更為重要。他們需要發展具體的、國際性協調的團結一致形式。

13. 生態保護

對生態保護鬥爭遇到甚麼是最大困難的認識，過去30年來有極大的變遷。環境生態危機對社會的影響，已逐漸結合在生態保護者的想象中，因而喚起了真正的政治生態保護。危害的嚴重，現在已被群眾及進步的運動更清楚地了解。首先，是牽涉到大型基建計劃的地方(如巨型水壩)，及所有能源領域(核能、溫室效應)，和交通運輸(城市空氣污染，能源成本)，及最近農業企業經營(基因改造生物；瘋牛病；過量使用抗生素；水污染等)。極其重要的災害影響，已由氣候突然改變的威脅得到最好的證明。

細察生態環境的危機及其積累的全球性的問題，導致對生產力不斷發展的主張的激烈批評，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力不斷提升的想象，及市場的盲目機制。要考慮對生態環境的約束，如同考慮對社會需要一樣，就要求經濟政策能夠在長期間及極長期間在國際範圍內是可行的。這完全與自由市場的教條，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協定全力保衛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教條相抵觸。這就是新的關鍵性要求的基礎，當前國際主義政綱的主要成份：生態環境的安全。

14. 民主

“世界是非賣品”；西雅圖會議的反世貿協定，動員的口號說明了最近廣大公眾的意見，不再祇滿足於對一些特別政策的挑戰，而是宣佈全部反對被稱為全球適用的市場規律。可是，這自覺性祇是“反制度”及“一個世界的國際主義者”，未必是反資本主義的，尤其是在缺乏真確可信的社會主義出路的條件下。因此，它有可能被“人道的帝國主義”觀念所操縱，也可能採取一種退却的政治現實主義，這裡同樣是缺乏可行的出路，但終歸是培植了真正反叛及抵抗的潛力。

當代對市場規律的批判說到了根本的問題，事實上，拒絕金錢至上及降低人類關係的個人競爭精神——它造成孤立和增加不平等（在性別之間，社會階層之間，國家之間等等）；了解到獲得利潤的瘋狂競賽造成生態環境的致命危機；確定政治考慮與公民權利高於商人的權利。

今日對市場規律的拒絕，牽涉到的是民主問題較多於社會主義的問題。但這民主的要求，也關係到公民的人人平等，更加是進步的。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趨向，把資產階級民主本身所包含的內容也去掉了。從選舉產生的議會，允許其本身的權力被剝奪，去符合不是由選舉產生的、或者不是對選民負責的機構的利益；法律也被用來遷就商業與金融的規律。

問題與其說是有關國家主權，不如說是民主及人民的主權，不管它是表現在一個國家，或多個國家集團式的國際機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使到任何方面成了問題（醫療護理或教育、社會保障、或生態環境安全、發展模式等可能作出的政治選擇都成了問題。

公民的民主要求，儘管是基本的，但也有新的顛覆推動力。

15. 政治獨立

1997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觀念已大大失去其霸權。它的控制已經放鬆很多。全球化模式已經發生過幾次重大危機（所謂亞洲金融危機，繼而是俄國、巴西及美國的退休金恐慌）。最近股票市場的高漲情緒，並不能消解人民的記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治影響力，在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崩潰後已大為減低；世界貿易組織受到西雅圖挫折的影響，也每況愈下。

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最近已加深，甚至於受到第三世界統治者的抵抗（西雅圖會議時發生的事件就是見證）。上層的分化，下層的動員：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互相配合的局勢。但為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社會及進步運動必須成功地保留運動的政治獨立性。

歐盟希望在抵抗美國名義的旗幟下，聯合所有進步的及第三世界的運動。但它欲尋求建立的“歐洲力量”，絕不是一個向南方和東方開放的團結的歐洲社

會。北半球部份的資產階級（特別包括極右的傾向，或者保守右派極端傾向的保護主義者）主張“國家撤退”的保護主義政策，也是如此。工人運動必須提出與此相對立的國際主義、非民族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選擇。

第三世界國家的極權及獨裁政制或政黨，採取管制資本流通措施，例如在馬來西亞，企圖以抵抗國際貨幣基金規定的名義去抑制進步的運動。但對我們來說，反帝國主義的抵抗，必須仍然是不能避免地與民主的社會鬥爭相連繫的。

16. 商品化過程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促進市場領域的擴張，造成了新的質的跳躍。最近市場的擴張，針對根除第三世界仍留下用以維持生存的農業，由此危及到整個社會，使之貧窮化及瓦解。同時，它使文化創造的基本想像變得僅是商業的活動，與其他各種活動一樣，必須符合於自由貿易的規則和資本主義的財產法律——文化多元性不僅被破壞，而且還被不平等的競爭所壓倒；文藝產品出售後，購買者的意向隨時可以轉變，而無須要顧慮到創作者的權利。人受市場規律的支配，也可以從色情企業在國際上的增長，及半奴工新形式的出現表現出來。

生存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如水，已經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逐漸被私有化了。在發展生物科技和基因科技的名義下，市場制度甚至於要求對活着的微生物有專利權，這就是說，前所未有的私有化程序的實施，是為了跨國公司的利益。結果，不僅特別威脅到整個人類文化，也威脅到社會及生態環境的安全。

在這情況下，廣大的反對者陣營已經出現。帶來各種社會抵抗的形式；它們更頻密更緊迫地提出，要求擱置基因改造生物的生產，要求擱置新一輪的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等等。這顯示了一個新的雙重覺悟：嚴重性與事件發展的速度已達到了危急關頭。每一個要求的暫時擱置都會抑制市場的前進，目的是要給予時間，面對經濟利益的獨裁造成無可補救之前，使民主要求更強有力。雖然這主要是保衛性的，但這要求

也容許在進步的反攻中形成。

17. 戰爭

蘇聯集團崩潰之後，華盛頓就宣佈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開始了。這並沒有停止戰爭的進行，也沒有消除核子武器的威脅。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無秩序，引起國際及地區性的衝突。

在這市場全球化的時代，帝國主義的統治關係並沒有消失；它比以前更加影響到全球制度的不平等。因此南方國家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是如以往一樣至關重要。國與國間及地區間的不平等，在世界每一部份連續發生。這可能促成國家間緊張局面的恢復，也可能成為許多國家及地區的基本要求。人民有權通過民主原則決定自己命運，以至享有自治權，都是要肯定的。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國家及地區的要求，不管怎樣合乎法理，都可能導致族群間的衝突，甚至引起“種族清洗”。首先，這些要求並不如以往般帶有反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前景的性質，可以保證團結及普遍性。其次，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減少人民作為公民享有言論結社等政治權利的作用及影響，沒有這種政治空間，則彼此權利的互相尊重了解及確定將來的團結就變得特別困難。

同樣地，在列強當中，至少在世界上某些地區而言，吞併領土已變成沒有那麼重要，可是，控制交通運輸路線及系統，攫取自然資源和市場及勞工供應，仍然是最基本的。國家的軍事力量正如過去一樣，起決定性的作用，在這方面，美國使用其優越的軍力，便是很好的證明。因此歐盟要尋求統一其軍力及挽救在這方面的落後。至於強大國家(如美國及法國)拒絕參加開始進行的核子裁軍及停止軍火現代化的同時，也重新發動世界的軍備競賽；巴基斯坦及印度也在繼續進行核子武器試驗。

帝國主義的干涉，今天是隱藏在人道立場的緊急措施背後的。科索沃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然而，跟隨這戰爭之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50週年申明在東歐(及東歐以外的亞洲)的戰略野心，再次確定其在全世

界有採取行動的權利。如果有需要會獨立地不受聯合國約束。結果，各大強國(華盛頓、莫斯科及北京)之間緊張局勢繼續存在。今天看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軍事部門，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及世界貿易組織是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經濟領域一樣。

近年來，反戰運動的削弱，是國際主義動員的主要障礙。這種弱化必須要立刻克服：要加強廢除核子武器的鬥爭，如今天巴基斯坦及印度的運動和世界性的「2000網絡」聯合進行的鬥爭；重新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包括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重新將解決民族與地區問題置於社會主義前途之內，走向一個團結及社會變革的前途。如此，才可以阻止地區間衝突的增長，及永遠消滅種族清洗的陰魂。

重建全球的出路

18. 現階段的總結

自1970年代開始，美國及英國在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制下，新自由主義計劃真正能夠宣佈對整個宇宙的野心，祇是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蘇聯集團解體時才確立，令到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大聲叫喊“從現在起，我們是世界性的”。20世紀最後的十年期間，新的世界秩序已有力地部署，那是以犧牲工人階級及社會低層為代價的。但社會的抵抗仍阻慢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自1997-98年以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驗到首次大規模的危機，顯示了新統治方式出現的特別矛盾及強大經濟國家間的嚴重分歧的加深。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給所有社會及民主的鬥爭帶來新的框架。自從90年代中以來，意識的提高，儘管不平衡，却是可察覺的。最初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已帶來普遍對市場壟斷的批判，對社會危機影響的理解，及走向全球性出路的願望——甚至一個“自發的反資本主義”——儘管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本身往往並不懷疑，但抵抗鬥爭已獲得了顯著的國際性。

19. 合法性

當前時期，可以說是意識及政治分水嶺的轉折點

正開始。由於在工人運動遭遇到意識形態危機（特別是斯大林主義經驗的衝擊），資本主義的秩序仍然是佔上風。資本主義甚至以現代及進步的觀念去裝飾本身，引用“新科技”支持這論據。已發展國家的青年階層易受影響；但在資本主義要求和經濟效益的名義下，事實上促成社會倒退，於是這些進步的托辭也被削弱了。

同樣地，社會民主黨的積極同謀關係，特別在西歐，讓資產階級能夠削弱工會行動在許多國家的傳統基地（就業權及工資保障，失業救濟及房屋，醫療保險及退休金等本是可以指望的）。這意思就是說，從現在起，保衛過去爭取到的權利及滿足基本的需求，必須採取更直接反資本主義的特點。

新世界秩序的合理性，證明在社會上及地理上是有限度和有疑問的。鑒於這制度不能夠提供一個協調的發展模式（特別在南半球當地社會分裂起支配作用），不能夠履行對東歐國家的保證（過渡到資本主義造成大多數人民陷於被剝奪社會保障的惡劣窘境），不能夠消除生態環境矛盾的增長（在能源、環境污染、食物安全等方面暴露出來），不能夠回應工人的期望，包括在最先進的國家也是如此（就業權及社會保障等）。

20. 滙流

在目前經常出現人民及公民的鬥爭的國際間聯系，是由於抵抗新自由主義政策及金融或經濟機構（反對第三世界債務，反對市場壟斷，反對結構調整，反對不平等交換等）的聯絡網所協調的。這些滙流發生在成功的主要集會（西雅圖是其中之一），但尚未能夠發展成為持續的、協調的機構。這聯系已經可能（及必需的）造成各流派間持久的相互影響。這些流派和我們一樣，是為解散新自由主義秩序（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而鬥爭，為建立一個不同性質的出路；它們也有激進的目標，就是要徹底改革這些機構。

更一般地說，我們的任務是為激進的左派發展出一個短期的綜合綱領，和重新闡明社會主義的出路。基本的目標是發展由市民管治的中心主題，及由此推

出反對生產工具私有財產。但我們必須尊重各方使用的方法和目標：我們的計劃是創造一個以人人都能夠有適當生活作先決條件的社會；我們的政治綱領就是要表明：要剝奪私有財產權才能達成這目的。然而我們並非以我們的立場作為參加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鬥爭的先決條件。

在最近將來，我們的任務是鞏固國際間的團結抵抗運動網絡。因為這提供可能恢復集中行動的架構，及促進新的國際主義社會與公民運動形成。

21. 綱領性的軸心

反對新自由主義秩序各種不同形式抵抗的團結過程，是可以通過多種綱領性的軸心加強的，包括：

——面對目前資本主義特別庇護的不平等及貧窮的增長，必須重申社會平等的目標。男女平等是這方面的主要考驗。保證全體的權利，從最低工資開始，是所有社會進步安定的基石。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賦稅必須是重新分配財富的和提供社會基金的方法。傳統的農業必須給予協助，使其穩定發展和逐漸改進（類如基礎結構，（信貸與保證價格）。每一措施的要點，就是將平等的目標置於追求利潤之前。

——世界經濟必須在合理的基礎上重新改組。自由貿易的狂熱必須放棄，代替的是重申國家控制如何，加入世界市場和組織地區合作。債務實際上已多次付還，它們必須取消；相反的，帝國主義國家必須以轉讓科技和保持持續發展，去償付它們對其他國家的生態環境欠債，這要求使能源和農業政策，在世界平面互相協調。

——資本主義中斷了社會權利的發展，抑制科技進步發揮其自身的潛力，並將主要社會及生態的選擇，局限於狹窄的在簿記上顯示的利潤。相反地，新增加的生產力應該用在社會方面。減少每週工作時間是回復到新的全部就業的最直接方法，擴大休閒時間及實現轉向非生產性的發展；擴充社會保障及管理公共服務，是通過盡可能與使用者關連的途徑建立的機構。這樣，社會需要才能以非市場化的手段來滿足。

——資本主義生產組織及其失去控制的金融部

門，使科技的進步變成為社會與生態環境的災禍。為了讓其他的標準和路向得以存在，必定要強加於市場的自然運作之上。但這取向提出了財產問題；財產問題要從活生生經驗的基礎中再作具體的說明。金融部門將利潤私有化，而將損失社會化，根本是以經濟的不穩定為代價的。作為緊急情況下實行的措施(例如在墨西哥及日本)將銀行國有化，是格外重要的議事日程。堅持滿足基本需要，要求質素安全，反貪污鬥爭，都可能要強調要求將交通(例如英國的鐵路和油船)、食物、水和電力國有化或重新國有化。這就是將資本主義增長的模式與另一發展出路的觀念相對照，主要目標是要能夠滿足最大多數人的社會需要，同時有效地考慮到生態環境及限制將主要關係到人類的將來。

22. 尋求新的平衡

全球化運動抵抗的成熟過程，是伴隨著走向必需的、新的社會和組織性運動的協調，社會運動(工會及其他草根階層運動)已逐漸地再度成為動員及強大國際行動的中心發動者——在過長時期失去其中心重要性之後。這樣的新平衡，提供給進步的非官方組織(不管是發展問題環境保護或人道主義行動的工作)新的機會去補足社會的根基；發展整個政治遠景和積極抵抗制度化(這變化過程已經破壞了許多非官方組織的獨立性)。

23. 政治

對國際鬥爭提供凝聚性及持久性的推動力，今日必須重新創造一個全球的另一出路以對抗不平等、高度競爭、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建立這樣的全球性出路，祇能建基於目前群眾經驗及民主運動，和它們表達的社會、環境保護、政治等需要。

這必須要求進步的及革命的政黨作出極大的努力，能夠貢獻增強運動的團結鬥爭和集體思想的能力；能夠對20世紀歷史有清楚明白的解釋，重新掌握過去及現在鬥爭的連系；能夠將生氣灌輸入新的、激進的、民主的國際主義；能夠恢復反對資本主義出路的可信性有效性，及提供重新建立與社會運動密切相

關的綱領基礎；總之，為了重建社會主義的計劃，必須依靠自發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進步的及革命的政黨在國際上協調合作的能力，今日仍停留在很弱的階段。在世界一些地區獲得新的發展是可見到的(如1998年在悉尼召開的亞洲太平洋團結會議，及往後一個時期的表現)但在拉丁美洲的聖保羅論壇開始的動力則早耗盡了；在西歐由於長期間缺乏政黨的帶頭作用，顯示在這方面仍沒有達到較持久性的成功。不過，現在愈加緊急的需要一個比目前已存在的更廣大的多個政黨組成的國際。第四國際各國組織必須積極努力於國際主義的復興，責任非常重大。

24. 國際主義

使人與人在世界市場上彼此互相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的根基，亦是為工人組織提供國際形式的根基(這樣客觀的根基也許是首次出現的)。事實上，這是唯一能抵抗全球化影響和有效的鬥爭道路，也是主要的保證，使之能夠抵抗反動勢力回復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和愈來愈多急速發動的絕望性野蠻戰爭。

雖然世界各地或不同的社會部門的情況仍然很不平衡，國際團結的新體系已真正產生。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秩序與跨國公司及大銀行的規則的不同形式的聯合，事實上已經產生。新組織形式的出現，是由有關的不同組織網絡間經常的合作促成的(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債務、及結構調整、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商品化等鬥爭)。近年來連續舉行的集會，是動力積累的開始，集會上交換經驗，闡明共同追求的目標，發展共同綱領與行動計劃；繼續這過程，我們就能夠考驗新的正在萌芽的國際主義形式，它們帶有不可避免的各種差異，我們可從中辨別出最適當的、能導致建立更廣大匯流的抵抗團體，表達社會運動的激進主義，及磨煉出對抗目前統治制度的各種出路和選擇。

王敬譯自《國際觀點》第351/2號

生態與社會主義

米高·洛伊

〔第四國際第15次世界大會對生態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是她歷史上的第一次。這個文件，在將近兩年前在《國際觀點》刊出了草案。經過國際執行委員會討論後，由草案委員會作出了修訂。〕（註）

在大會討論一些建議的修正案期間，一個生態委員會代表們進行討論。最重要的議案是由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G，英國支部）提出的，原文的中心思想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是氣候變化的問題。這個論題不被草案的編輯們所接受，但是他們同意加強決議草案處理溫室效應和氣候變化這部份，在原文的其他評論被認為是有用的，都採納入決議中。除了一篇日本同志所提的兩頁建議外，《帝國主義違反自然》這篇文章向生態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威廉·摩利斯（William Morris）、弗拉迪米爾·韋爾那斯基（Vladimir Vernadsky）致敬，並且重提厄內斯特·曼德爾所批評的盲目相信技術全能的資產階級思想特點。

在全部會議中，討論是公開的，由米高同志作介紹，面對着日益迫切的和威脅着人類未來的問題，他堅持生態問題對更新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重要性，這個決議草案第一次嘗試克服我們在這個領域的落後。根據當前的生態危機，面對這個決議草案，也帶領我們在更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像生產力發展方面的某些傳統觀念。

貝納德同志，草案的另一個合編者，環繞整理後的草案加入如下的內容：

1. 工人運動一直要求進一步管理生產。生態鬥爭使這個要求變成明晰的民主要求，加深對它的理解。這個要求也提出社會管理中更為複雜的問題，因為它不再僅僅是工人干預生產工具，而且有關民主管理

方面，有時還要解決矛盾，這就與全體居民發生聯系。

2. 我們的派別應該更加清楚地認識自己，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國家，挑戰與資本主義制度有關係的“生產專家”，並且描述社會上的生態社會主義組織的基本特質。這次大會文件的提案在這個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步驟。

參加討論的絕大多數人都表明同意文件的總精神——依照一位日本同志的說法，在我們運動的思考中，對突出事件要及時提出清晰的、正確或者最新訊息的建議。

來自荷蘭支部的一位同志建議在世界大會之後，我們的運動應該舉行一個國際生態討論會繼續詳細討論這個主題。這個建議被接受，一個國際委員會將規定這個討論會的日期和方式。另一位荷蘭同志批評文件的一般語氣，尤其是在行動綱領方面——照他的觀點看，有些不很實際的要求：例如，提出立即放棄核電力的建議，將會失去法國和比利時70%的家庭能源。他也關注到軍事核廢料的重要性，比起民用核電力要危險很多。最後，他的意見認為，任何技術都顯示內在的危險，並沒有一種應該被考慮作為萬應靈藥。

一個活躍在生態運動的法國同志強調太陽能有巨大的潛力，這種能量有系統地被資本主義的技術科學所忽視，因為它是免費的，而且不能發展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商品。

一個提供討論的主題被許多參與者關注的，是綠黨的政治主張。有些德國、印度或者北美洲的同志認為，需要更嚴肅的批判這些政治力量的保守錯誤，而其他的人則在相反方向去思考，認為必需與這個派系溝通，這些討論期望會深入，並且希望維

持與這個派系聯系。

有些同志認為文件對於有爭議性問題，迴避表明立場，像生態的稅收或者較節制地生活的必要性。根據英國同志的意見，認為能量的取捨不是解決的辦法，需要嚴厲地減少人類能量的消耗（高達50%）。在他們的文件中，甚至建議集體地聚居方式，代替現時的個別居住以節約能量。這些提議不被接受寫入草案中。

其他的提案修正的或者補充的都被起草者們接受了：

來自黎巴嫩、厄瓜多爾和菲律賓同志的提案，強調在南方各國形成的生態環境的損害，資本主義跨國公司摧毀了他們的森林，出口被禁售的農藥到他們的國家去，並且輸出工業廢料或者核廢料到南方國家去。將這種情況告知北方國家的輿論，並且也要譴責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物搶劫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製藥者盜用和專有本土人的傳統知識。

厄瓜多爾和印度的同志察覺到，指責貧窮農民的國家，或者由於採伐林木作燃料而摧毀森林的本土人民，那是錯誤的，它是亞馬遜河地區或者印度的本土公社，反對過跨國公司的掠奪。他們保護環境就像保護全人類的自然遺產。

來自西班牙馬德里的一個同志強調，很有必要制訂一個保護生態的綱領，以供我們工會的干預之用：

1. 工人健康與環境衛生之間的關係：有毒的生產對於工人和自然都是危險的；
2. 工人管理生產，利用非污染的技術；
3. 工業、運輸和農業的生態恢復原狀，作為創建職業崗位的政策。它並不意味着保證在核電站或者武器工廠裏當前存在的工作職位，但是，不論需要什麼生產調整，都要保證每個人有一份工作。

來自意大利的同志，請求把環繞水的問題的需求，應該包含在文件之內，它已經成為北方（西班牙）和南方國家（玻利維亞）群眾社會鬥

爭的主題，而且是關鍵的問題。這是一個私有化和水源污染兩種鬥爭的問題。它是對於全球正義運動的一個關鍵問題。這個問題已經在世界論壇關於“水”的節目中，找到一個最初的表達方式。

希臘的同志建議，在城市的環境問題中加上一節：在城市空間減少中，公衆服務私有化的作用；不受控制的城市擴大化；綠色空間的消失，因公路和高速公路而毀滅樹木和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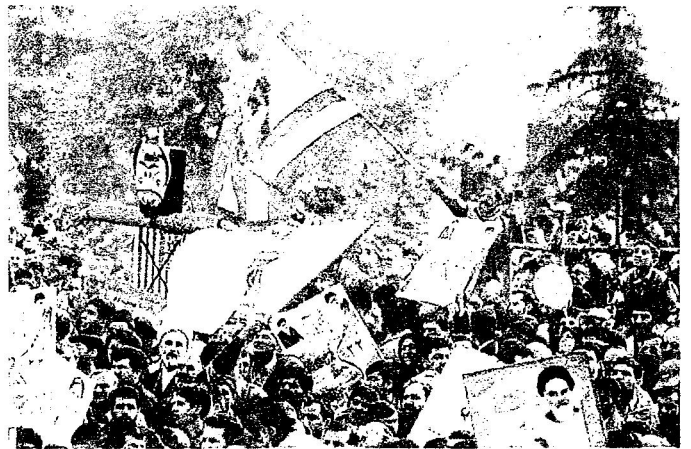
荷蘭和巴斯克（歐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區）的同志堅持文件要強調由於戰爭造成環境破壞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帝國主義軍事侵略伊拉克、南斯拉夫等等。由於軍事核廢料所引起的重大問題，文件也有必要加以考慮。

在總結中，報告人對於一些批評作了答覆，並且負責修改草案，不試圖停止爭論，反而更加要鼓勵它——這不是一個進程的終止，而是開始。

修正了的文件，差不多全體一致地通過，只有一票反對，一票棄權。

（楊萍譯自《國際觀點》第349期）

【貝納德（Bernard）、羅倫特（Laurent）和米高（Michael）（大會報告人），是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生態委員會的同志，負責集中決議草案的撰寫和修改】



尊敬的劉家良叔

李平

1941年秋，我從香港到上海升大，當時去升學的青年不少，如林植權、鄭鳳韶、劉寬德、劉寬全、劉大漢等人，考入各所大學。這當中，有的和我一樣，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SY），有的是同情者。到上海後，有位40來歲的長輩，熱情地接待我們，他就是劉家良，廣東中山人，北大學生，從事托派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抗戰爆發時釋放出來，如今是托派多數派的第二號人物，大家把他尊稱為“良叔”。他平易近人，對人關心體貼，語重心長，給我們談學習，談時事，講馬克思主義，有聲有色，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一起。

我考入大夏大學，但到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上海的英法租界淪陷後，父親從澳洲給我的接濟中斷了，所以我只讀了一年就輟學了。

有一天，良叔找到康君和我到公園去，在沒有人的地方，很嚴肅地與我們商量一件事：由於上海租界淪陷，我們的鉛印《鬥爭報》不能出版了，只能用油印出版《校內生活》（黨內部刊物），這個任務想交給你們去做，這是一項重要的而且是保密的工作，你們要認真考慮一下，你們認為怎樣？我們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良叔還說：有個附帶的任務，由於日偽隨時入屋搜查，因此許多書籍不便存放在家裏，想由你們開個書攤，擺放這些書本，普通的可以擺出，重要的就用麻袋裝着，你們還可以利用這書攤賣賣文具之類，維持生活開支。我們也都同意了。良叔還再三交代：這是一項保密工作，從此你們不與其他人來往，也不告訴任何人，我會單綫與你們聯系的。就這樣，我們接受了一件神秘而又嚴肅的工作。

良叔親自和我們一起，在白克路菜場里租了一個原來賣學生文具用品的小鋪位，十分合適，不久運來了許多書本，有的放在書架上出售，有的則封存起來，櫥窗里有文具，後來我們還去食品廠買來麵包出售，兩個年青人就好像在做小生意。

良叔與我們單綫聯系，要出版《校內生活》，就親自把稿件送來，然後康君或我留在家裏刻腊版，等到刻好後，兩個人一起油印。那時候做秘密工作，是不用油印機的，只用一塊磨平了的膠皮釘在小板上，粘上油墨後就往膠腊紙上刷，沒有油印機，收藏起來方便得多。由於只印二三十份，也很方便。當時的《校內生活》主要是一些爭論文章，與少數派爭論，抗戰問題也與陳獨秀爭論。抗戰初陳獨秀出獄後，積極宣傳抗戰，要派王凡西到軍隊裏工作，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却遭到共產黨的惡毒污蔑和攻擊，無中生有地污蔑陳獨秀拿日帝津貼，是漢奸賣國賊，迫使陳無法活動。而在上海的托派，在日帝的鐵蹄下，連《鬥爭報》也不能出版了，油印的《校內生活》，只供大家討論爭辯。

那時候，良叔與我們聯系，每周或半月碰頭一次，他常拿着英文版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給我們講1925—27年的大革命史，後來他把此書翻譯出版了。我們看到良叔寫的文章，都是寫在學生練習簿上，密密麻麻的，極少刪改，小標題是最後才加上的。我們也看到他的好幾本讀書筆記，研究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寫在學生練習簿上。他的思路十分敏銳和清晰，智慧是超人的。

這舊書攤大約開了一年左右，局勢逐漸平靜，書本可以放進倉庫了，書攤便失去作用，於是關閉了書攤。我先去學校教書，後來到體育會去管理圖書。《校內生活》則由康君負責，油印時我去幫忙。

由於良叔時常到我們家裏來，房東看見我們是一家人，都是規規矩矩的好人，對我們非常客氣，後來前樓空着，房東就慫恿良叔搬到這裏居住，良叔也竟然租下了前樓，我和康君住在三樓亭子間，大家更密切了，其實這是一次疏忽，在那秘密工作時期，隨時有被敵人破壞可能，怎可以大家住在一起呢？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1944年夏，小沙渡路一間綢緞廠，老板無故開除工人，激起工人公憤，幾個工人停下工作向老板說理，老板竟然報告了巡捕房，結果把幾個帶頭罷工的工人抓去，這當中有我們兩位同志：秋大姐和羅真。

我們還有一位到工廠工作不久的楊玉瓊同志，她自告奮勇，親自送飯到巡捕房給工人代表吃。捕房的“包打聽”看到她戴着近視眼鏡，講的是廣東口音，懷疑她是共產黨，報告日帝憲兵，便把她抓了起來。這位女楊從香港來，響應“到工人中去”的號召，才到綢緞廠工作不久，她從沒有經過鬥爭的經驗，一經嚴刑拷打，神經就錯亂了，便胡亂交待了劉家良和鄭松的住址。日偽便四處抓人！

幸而綢緞廠罷工發生後，尤其是女楊被捕之後，組織考慮到她沒有經過考驗，凡她知道地址的人，良叔和鄭松都已及時轉移，却抓了租屋的保人高擎宇，和在良叔家裏搜到體育會免費洗澡的證件，輾轉抓到我和康君。那天我剛送良叔到吳淞口，他一家人乘船逃往溫州，回來後我就被捕了。我們六人被捕後，巡捕房就把幾個工人放了。我們被關押在福州路警察總局，日帝的特高科對我們嚴刑逼供，那時楊玉瓊已是個瘋女，高擎宇一副生意人的模樣，我和康君即使被拳打腳踢，灌水逼供，對劉家良現在何處，一問三不知！因而再沒有連累其他人。後來日偽也相信我們並非共產黨人，一無收獲，關押大半年後就交保釋放了。楊玉瓊則由秋羅兩人把她送進松江瘋人院，後來聽說她逃了出來，赤身露體，死在馬路旁，日本帝國主義又欠下一筆血債！

這次綢緞廠罷工事件，我們先後有六個同志被捕，幸而良叔與鄭及時轉移，沒有被牽連。聽說敵人逮捕高擎宇時，彭述之也在他住處，聞聲奔上天台，跳到另一幢樓的天台上，險些兒也被抓去或跌死，否則，彭劉兩位領導人遭殃，組織也就遭到致命打擊了！

我反思，當年在敵人的鐵蹄下，革命者只能作隱蔽性的鬥爭，公開的罷工鬥爭會付出重大代價的。

抗戰勝利後，良叔從溫州回到上海，那時候中國托派公開出版《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和

大型理論刊物《求真雜誌》，組織上有了很大的發展。良叔是兩個雜誌的編委，每期的《求真》上都有他的長篇政論文章，筆名為“劉少嚴”、“海生”等。良叔由於積勞成疾，身體很不好，他住進仁濟醫院時，我拿着鷄湯去看望他，他很高興，還是非常關心我的學習，給我出題目要我寫文章，後來我在《青婦》上發表的《家長制教育的危害》，就是他在床上指導我寫成的。

1949年初，那時我在國民黨監獄裏，上海解放前夕，良叔等中央負責人撤退到香港去了。我釋放後回到南方，後來到了香港，那時良叔已去了越南，想在越南居留三年後即可到法國定居。但慘痛的噩耗傳來，良叔不久便在越南遇難。關於遇難的經過，陳碧蘭當時與他同在越南，據說她後來在所寫的回憶錄中敘述，良叔接受越盟佔領區一個參謀長（以前的托派份子）的邀請，去討論發展托派運動問題，說保證有軍隊護送，但在開完會後便把良叔等人逮捕，良叔後來便在獄中逝世。在他應邀之前，碧蘭夫婦曾堅決反對他去，他自己也曾動搖，但在越南同志的堅持下，良叔為責任心所驅使仍決定去。結果，他便為了事業而在壯年犧牲了，時年還不到五十歲。

在抗戰時期，良叔曾撰寫了許多篇文章，堅決支持抗戰，反對少數派對抗戰的「革命失敗主義」；也反對當時的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集產主義的理論，而堅持蘇聯是官僚主義墮落的工人國家這一傳統意見，繼續主張無條件保衛中國和蘇聯的一貫立場，從而在政治上、組織上保衛了托洛茨基主義。

良叔原在北大時，有個妻子，生下一個女兒，被捕以後人各分散，抗戰時被釋放後，他曾四處尋找，音訊渺然。後來他與梁廷結婚，生下兩兒子，大兒子劉海生，解放後是上海虹口區教育局長，但英年早逝。小兒子是殘疾人，很少時就死了。幾十年後，良叔的前妻生下的女兒，到上海來尋找爸爸的下落，她已是東北某話劇團的名演員，後來找到鄭超麟老人，才告知她劉家良已在越南犧牲了。

突出托洛茨基著作的現實意義

瑪·霍道尼著

周仁生遺譯

【本刊 2000 年第 3 期（總第 201 期）刊載了以下一文的簡要摘譯，現得到周仁生老戰士年前對該文的詳細摘譯，特予以刊載，以讓讀者得以更全面地看到，同時作為譯者 04 年 1 月不幸病逝的一種紀念，從譯文可反映出譯者對托洛茨基思想的熱愛，以及譯筆所表現的信、達、雅的優點。——編者】

1999 年 10 月 29 日、30 日，有關里昂·托洛茨基的國際會議，在莫斯科召開。自 1994 年以來，這已是第五次在俄羅斯召開的托氏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約有 80 人，這是最有成就的一次會議。

會議由「托洛茨基遺作研究委員會」主持，第一次會議於 1994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期間成立了上述委員會。自那時以來，該委員會已主持召開了四次大會。第二次大會於 1995 年在聖彼得堡市召開，第三、四次大會先後於 1996、1997 年在莫斯科召開。

委員會的目標之一，在於揭示由俄國革命領袖里昂·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所作的貢獻，但托氏著作在蘇聯是被禁止的，他的著作和他的事業一直被埋沒在由斯大林、後斯大林蘇維埃政權以及國際斯大林主義共產黨用謊言、偽造和篡改堆積起來的大山之下。

委員會的衆多支持者認定，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他的革命事業，是把馬克思主義方法最有意義、最有價值地應用在 20 世紀。支持者斷言，如果人們要想理解今天世界，要想發動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統治並建立社會主義世界，托氏的著作是不可或缺的。

同樣，還有不少人相信，對托氏的歪曲和誹謗，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了，旨在壓制對斯大林主義、對革命以及我們時代的其他主要事件發展作出馬克思主義理解。他們說：研究、理解、學習和應用托氏思想，是找到人類前進道路的一把鑰匙。要達到這一目的的先決條件是安排好機會，冷靜而又忠實地討論托氏的思想及其著作，這就是所有五次大會的目的。

本次大會的三次會議期間共提出 15 篇論文，其主題為「托洛茨基的世界 120 年來的鬥爭史（1879-1999）」。「左派反對派史和托洛茨基傳記」以及「托洛茨基與民族問題」的兩次會議是大會第一天，在俄羅斯科學院舉行。有關「資本主義復辟進程以及托洛茨基的現實意義」等課題於這次大會的第二天，在國立莫斯科大學附近索尤茲（Soyuz）旅館的會議廳舉行。以下是大會發言者主要論點摘要：

1. 馬克·戈洛維茲寧，他是一位教授，俄羅斯學者及 V·羅戈文的支持者（V·羅戈文是研究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歷史學家，已於 1998 年 9 月逝世）。

馬克·戈洛維茲寧在大會開幕式上，提出「托洛茨基與左派反對派的新道路」為題進行討論。他首先注意到 20 世紀 80 年代的特點是知識份子享有坦率 and 公開發表言論的氣氛，那時左派反對派提出的新道路是可以討論的，但在 1991 年以後，當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開始落實時，這種氣氛便告終了。今天，在俄羅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是由新政權培育起來的，這種思想體系以冷戰時代的手法把斯大林主義的起因歸咎於革命。然而，他接著又分析說，儘管俄國革命史遭到了新的歪曲和篡改，而事實仍然是：對當前危機討論的基本架構仍是由左派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所提出來的，這就是不斷革命論和國際主義相對於斯大林政權的反馬克思主義論點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戈洛維茲寧教授對歐洲歷次革命進行了綜合評述，他指出所有這些革命——從 1848 年到 20 世紀 30 年代的西班牙內戰——都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這恰恰是因為歷次革命並沒有轉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1917 年的俄羅斯沒有別的選擇了——或者是為了帝國主義投資者、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財產利益實行軍事獨裁，因為這些階級都力圖摧毀工人、農民和士兵的；或者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去提高城市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但俄羅斯革命需要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援助，而這一有力

的援助卻從未到來。斯大林主義以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想，促成蘇聯的孤立。斯大林時代對政治、經濟新道路的鎮壓，又在今天重演了。

戈洛維茲寧教授解釋說，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是相同而是相反的。這一結論隨同反對派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史一起，被當今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所忽視或否定了。就此意義來說，V·羅戈文所著的八大卷叢書為在政治上反對斯大林主義作出了澄清史實和政治的唯一和具有決定性的貢獻。

2. 米哈伊爾·沃耶科夫，他是托洛茨基遺作研究委員會的俄羅斯協調人。他報告的內容是有關他對檔案的研究，並聯繫到 20 年代由莫斯科戈齊茲達（Gosizdat）國家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選集叢書。1927 年托洛茨基被蘇聯開除出黨之後，此項出版計劃便擱置下來了，儘管至少有 23 卷列入出版計劃，但在托氏著作遭到壓制之前，僅有 12 卷問世，不久托氏便被逐出境。委員會應把加速出版這些遺留下來的資料作為自己工作的一部份。

3. 繼沃耶科夫之後的是佐姬·塞里勃里雅科娃，她父親是塞里勃里雅科夫，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左派反對派支持者，1937 年被斯大林殺害，80 年代後期恢復名譽。佐姬·塞里勃里雅科娃在新開放的老檔案中找到了長期被埋沒的 1927 年托洛茨基寫給她父親的信，此信在 30 年代被沒收，一直由斯大林本人收存。托氏在信中談到他在 1927 年黨大會上揭露斯大林策動一場篡改黨史和蘇聯史的運動，力圖抹掉托氏的作用，提高斯大林在打敗鄧尼金的聲譽。後來，斯大林索性在偽造歷史中把自己說成是打敗鄧尼金的唯一功勳者，不僅隱瞞了托氏是當時紅軍組織者和領導人地位，而且也隱瞞了他父親的作用。實際上，打敗鄧尼金的軍事計劃是由托氏提出的，而斯大林是反對這項軍事計劃的。佐姬根據檔案材料以及她自身經歷，引人注目地回顧了內戰時期具有決定性的歷史。

4. I·布特雷茨基（I·Lya Budraitskis），是莫斯科托洛茨基派的青年活動份子。他特別提到了第四國際《過渡綱領》的現實意義。他說：《過渡綱領》是從民主要求有機地過渡到社會主義要求的綱領，是全面地使工人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基本問題仍然是解決失業和通貨膨脹。《過渡綱

領》要求少勞動工時，隨物價指數增加工資，成立工人委員會，有對工人負責的專家們協助解決財政和技術問題，所有這些仍然是今天的基本要求。工人控制了產業，就會成為經濟計劃化的一所學校。創建工人民兵組織，武裝民兵，才能保護工人自己，反抗對工人的鎮壓。

他一再強調，今天在俄羅斯，《過渡綱領》仍然是把工人組織起來很有現實意義的綱領，也是未來工人階級革命黨的基本綱領。

5. 阿列克謝·科茲洛夫，出生在沃羅涅日州，他也是一位托洛茨基派青年活動份子，也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L）俄羅斯支部的成員。

他的論題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馬克諾》。馬克諾原是烏克蘭游擊隊的領導人，這支部隊主要由比較富裕的農民組成，屬於紅軍的一部份。但馬克諾不服從中央領導，托洛茨基曾力圖說服他，但失敗了。

斯大林的合作者伏羅希洛夫急想在這個地區擴大他的領導權，陰謀反對馬克諾，馬克諾的游擊隊轉而反對紅軍，把布爾什維克趕出了他所控制的地區，並與鄧尼金結成聯盟，紅軍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摧毀馬克諾游擊隊一條路。現在有人指責布爾什維克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托洛茨基是力圖保護工人與貧農的蘇維埃政權的。

在討論科茲洛夫的論文時，提出了許多論點，其中有一位叫鮑里斯·斯拉文的人，他原是前聯共黨員，現在轉而支持托洛茨基委員會，他說斯大林曾宣佈托洛茨基為法西斯主義同謀犯，而事實是托氏積極地反對法西斯政權，並預言德蘇必會發生戰爭，而那時，我們必須支持蘇聯反對希特勒政權。托氏的這一論點導致托洛茨基運動的分裂，因為許多人認為斯大林主義和希特勒主義是同一東西。

斯拉文繼續說，現在許多人把蘇聯看成極權主義國家，托洛茨基也是這樣說的，然而托氏的方法是通過分析的，他從他所理解的極權主義政權得出蘇聯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可以說沒有任何別的評論家能像托氏那樣對理解 1991 年蘇聯所發生的事變作出更大的貢獻了。過去的蘇聯並非社會主義，但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已為未來社會奠定基礎。20 年代末期前，蘇聯遭受極度的扭曲但仍沒有改變

十月革命所奠定的經濟基礎。1991 年的事變，不僅消滅了蘇聯的壞事——極權主義的政權，而且也消滅了當時仍認為好事的經濟基礎。俄羅斯人民是理解這個道理的。斯拉文講了一個正在流傳的軼聞：有知識份子告訴工人們說，1991 年前俄羅斯所存在的不是社會主義。工人們回答說：「那就讓我們回到不是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去吧。」斯拉文的結論是：工人們要回到以前是好事的俄羅斯去——有經濟效益，有工作保障，有社會福利設施等等——這就是說儘管斯大林主義所代表的是政治墮落，但十月革命使這些好事成為可能。

6. V·羅戈文的妻子，加麗娜·伊凡諾芙娜·羅戈維娜評論了人權活動家的工作，指出在懷念斯大林時代的無辜犧牲者時出現盲點，那就是把 20 年代、30 年代的英雄左派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排除在外，而他們都是傑出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為了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鬥爭而獻出了自己生命。60、70 年代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常受到懷念，為什麼這批早期的持不同政見者都受到冷落呢？論才幹和氣質，早期的這批英雄要比 60、70 年代的持不同政見者，要高出十倍以上，他們都是國家領導人，傑出知識份子。反歷史反人權的罪惡仍在繼續著，我們必須向全社會公開我們的討論，使人民能夠理解。

7. 會議第一天的下午，「托洛茨基與民族問題」的討論，引發了充滿生氣的爭論。來自紐約的瑪麗琳·霍·道尼，就《托洛茨基的戰時通訊：巴爾幹與 1912-13 的巴爾幹戰爭》作了報告。這次戰爭奪走 50 萬生命，使巴爾幹半島變成了因瘟疫而死亡者的墓地。（以下摘譯）瑪麗琳說，托氏當時作為戰地記者從巴爾幹發來報導，詳細談到了階級力量起到了主要作用。由歐洲帝國主義列強所扶植起來的巴爾幹統治者，為了少數人利益而使工農大眾付出了慘重代價。

瑪麗琳把托氏的著作，聯繫到今天的科索沃戰爭，說明戰爭、反猶太主義、沙文主義僅僅是為了寡頭主義的利益。如今天南斯拉夫由米洛舍維奇所煽動的沙文主義去摧垮科索沃，由美國和北歐所指揮的力量去摧垮塞爾維亞，以及俄羅斯資本主義勢力去轟炸車臣等等。這就是托洛茨基著作的現實性。因此她建議應把托氏著作譯成巴爾幹諸國語言

和原文俄語，在巴爾幹及前蘇聯境內出版發行並廣為流傳。

8.（摘譯）下一個發言者是索爾頓·柴拉托夫教授，俄羅斯科學院政治經濟學家。他引述 20 年代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有關民族問題的通訊。柴拉托夫說，列寧請求托洛茨基加入他的行列，去反對由斯大林及其集團培育起來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但列寧死後，托洛茨基因某些原因而沒有參加戰鬥。柴拉托夫說：「斯大林沙文主義扭曲了民族政策和民族關係。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是世界文明的最偉大的成就。事實證明蘇聯一旦瓦解，國際衝突便像戰火一樣點燃開來了。」

柴拉托夫轉而談到高加索民族問題。二戰期間，高加索的少數民族被斯大林逐出了家園，只在赫魯曉夫時代，他們才恢復名譽返回家園。但今天莫斯科的所謂「民主」政權，不是採取和解政策，而是挑動一個民族去反對另一個民族。

9. 接著發言的是塞爾蓋·德尼西烏克，來自烏克蘭首都基輔。他引述列寧在烏克蘭實行保護民族權利和民族語言的政策，但曾經與傑出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皮達可夫和賴可夫斯基有過不同意見，而特別是列寧死後，遭到斯大林的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反對。

塞爾蓋不同意柴拉托夫的說法，而堅持說民族衝突的爆發決不是蘇聯一旦瓦解了才引起的，而是需要經過長時期的發展的。80 年代前蘇聯境內民族衝突的爆發，是在蘇維埃時期長期都積下來的怨恨的爆發。要對此負責任的正是 30 年代後期斯大林所推行的民族政策。

10. 在討論中，安德烈·庫列昂謝夫，來自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活動家，他也不贊同柴拉托夫的意見。安德烈說，1923 年托氏提出，在語言文化領域內，要給予非俄羅斯民族以最大的讓步，在物質領域內要給他們有最大的獨立性，而要不妨害總的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目標。托洛茨基如同列寧所做所說的一樣，要尊重經濟不發達的民族，與他們的關係是幫助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教師。柴拉托夫一再重複他的觀點，認定 20 年代布爾什維克革命在民族問題上的成就，是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但他堅持說，托洛茨基並沒有像列寧那樣抵制斯大林的俄羅斯化

政策。他的斷言受到其他發言者的反駁，發言者指出托氏在 20、30 年代的著作和演說中，高舉列寧在民族問題的旗幟，支持了左派反對派。

這次大會第三次會議於第二天舉行，論題是《資本主義復辟進程和托洛茨基在今天的現實意義》。這次會議廣泛地討論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

11. 洛勃·瓊斯是前蘇聯工人國際委員會的組織者，也是這次大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他談到俄羅斯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他說資本主義已在俄國復辟了。蘇聯時期 60-70% 的經濟，依賴國有化工業的生產，而今天絕大部份生產則依賴出口國外市場的提煉工業—石油、天然氣和自然資源。勞工市場並沒有發展，但這是因為許多非生產性工人仍然保留在工資冊上，因此他們沒有失去利益。價值法則現在與過去蘇聯時期一樣仍然起作用。過去這法則是用來測算產品價值，而不是價格，因此價值法則是失真的，但現在俄國價格已接近世界價格了，價值法則失真性已經沒有了。

12. 艾奧弩·庫爾馬諾夫，現任哈薩克斯坦共青團第一書記，也是工業中心城市肯托的工人領袖，他詳細說明了因市場改革結果及哈薩克斯坦的資本主義復辟而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艾奧弩也是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成員，是礦工抗議運動中的領導人之一，曾於 1997 年秋行軍到阿拉木圖，要求發給工資。結果，艾奧弩與另外一名工人被捕，這另一名工人因監獄條件太惡劣，死在哈薩克斯坦監獄中了。

洛勃說：哈薩克斯坦資本主義復辟過程，與其他任何共和國所發生的沒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不加掩飾，更加赤裸裸罷了。自從 1991 年計劃經濟崩潰以來，經濟調整便開始，這特別受到最富有盜竊性的納扎巴耶夫政權操縱。（納扎巴耶夫是哈薩克斯坦獨立共和國的總統，前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推行的經濟政策及其作為，極像新近被推翻的印尼獨裁者蘇哈托。）

艾奧弩指出：納扎巴耶夫「極具危險性的私有化」政策，是受國際貨幣基金會及歐洲重建和開發銀行支配的。其著重點落在開發世界市場型的原材料經濟部門。同時，商品加工經濟部門也遭到了毀

壞—諸如機器製造業、五金業以及其他重工業部門。共和國 200 多個最大企業已落在外國公司手中，包括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冶煉業等等。艾奧弩舉出了一個工業聯合企業為例，這個聯合企業原是蘇聯最大企業之一，由 30 個企業組成，工人多達 6 萬。現以一百萬美元賣給了一家英國公司伊斯帕特·卡梅特。另一設備系統是為前首都阿拉木圖供應電力的，價值幾十億美元，卻以五百萬美元被比利時一家公司收購去了。

艾奧弩繼續說道：現時，跨國公司實際上已佔有所有經濟領域——從電力部門到交通業到礦產開採。與此同時，整個地區「非工業化」了。哈薩克斯坦原有 60 多個小城市，建在特有工業項目及礦區周圍，現在所有這些小城市正在衰退下去。許多地區的人民，在這個礦源富有的國家裡，卻沒有了電燈、天然氣和熱源：他們只得在戶外利用篝火煮飯：跨國公司只要從它們利潤中抽出百分之幾付給國家預算局，而它們則可逃避交納賣給海外公司原材料的稅款。就這樣，國家預算便被奪去數以幾十億美元計的收入了。

多國公司與國際貸款機構控制了哈薩克斯坦經濟。民族資產階級若同多國公司實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帶有家族性質——主要是由納扎巴耶夫、他的家族以及他們的社會核心集團霸佔著。

政府政策已使共和國的人口急劇下降，從 1990 年的 1700 萬，下降到 1995 年的 1450 萬。根據兩種不同統計，一說是 60% 人口，另一說是 90% 人口已經拿不到謀生的最低收入了。至於失業人數，還沒有可靠數字，但可能高達 500 萬人。據統計，1990 年有 760 萬人在各個行業部門工作。到 1997 年，受僱工人僅有 360 萬。工業部門失掉 400 萬就業機會。哈薩克斯坦經濟政策超越了俄國水平。通過了反勞工法，把危險性高的工業部門工人退休年齡提高到 63 歲，而他們的平均壽命僅 55 歲。教育改革卻取消了中、高級技術教育享受免費入學待遇。城市中社區服務的私有化，使社區的生活費用高過了大多數工人所達到的水平。政府正在制訂法律使土地私有化，這就為外國公司徵購土地鋪平道路了。

艾奧弩最後帶總結性地說，哈薩克斯坦正被改造成拉丁美洲和非洲模式的資本主義體制，這種資本主義發展完全依賴世界市場和多國出口的。他

說，我們的任務是要把受改革嚴重削弱了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學說，仍然活在人們心中，而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理念將在工人和青年中找到廣大聽眾。

哈薩克斯坦的經驗，即自由資產階級勢力十分虛弱，甚至不能組成自己政黨，這就證實了托洛茨基的學說——工人專政、社會主義革命，是全世界落後國家的唯一出路。哈薩克斯坦經驗也證實了托氏有關經濟上配合發展和不平衡發展學說的正確性，在資本主義無法解決大量社會問題的落後國家裡，證明唯有托氏的學說才能起作用，而且如何才能起作用。

弗拉傑米爾·沃洛廷 (Vladimir Volodin)，是新西伯利亞州的青年工人，他設計的論文主題是把右翼社會民主黨與斯大林派作了對比。斯大林派通常是與極權主義政權相結合，而社會民主黨則與議會民主相結合。然而，沃洛廷證明，在相同條件下，右翼社會民主黨與斯大林派是以完全相同方法進行活動的。托洛茨基的論據是，斯大林派和右翼社會民主黨有著相同社會基礎，那就是工人組織中的官僚階層，因此，這兩個政黨在工人運動中所代表的是同一勢力。托氏的這一立場經常引起某些人的反對。他的反對者認為，我們在西歐可看到社會民主黨扮演主要角色的議會民主體制。而另一方面，我們在蘇聯、中國、柬埔寨可看到極權主義體制，這些國家與極端主義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政權亦步亦趨。因此，左翼批評家們所支持的觀點認為，蘇聯和中國的右翼官僚集團代表一種特殊形式的資產階級統治，特別在國有化的經濟部門中。他們從此得出：斯大林主義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另一種形式，而在政治上靠近法西斯主義。當然，這就認為在斯大林主義國家內，社會經濟體制就是特殊形式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論點正確嗎？這些理論上的分歧就成為托洛茨基派有別於其他極左派思潮的基本事實。從表面上看，托氏的反對者似乎也有其可信的論據。

然而，我們必須更仔細地加以觀察。說斯大林派總是依靠極權主義統治，這是錯誤的。沃洛廷繼續指出，事實上，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裡，斯大林派通常支持的是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他們從自由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同社會民主黨合作去反對法西斯

主義。此外，在東歐，社會民主黨不但支持極權主義體制，而且在組織上與斯大林派合而為一，例如東德的社會主義統一黨，波蘭的統一工人黨。

沃洛廷得出的結論是：在生產手段私有制的條件下，斯大林派的行動是與社會民主黨一致的；反之，在生產手段國有制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的行動像斯大林派一樣。換句話說，在同一條件下，右翼社會民主黨與斯大林派是「一致行動的」。他舉了一個例子，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內，代表這兩種思潮的政治勢力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托洛茨基派和左翼無政府主義而一致維護議會民主和資產階級統治。

在同一情況下採取同一行動的根源是什麼呢？在財產私有制的條件下，工人官僚層，亦即工會官員及工人在議會中的代表，有他們的既得利益，在維護自由派政權中，他們便可保留由他們地位所提供的一點施捨物。資產階級可以任意解散工會，任意罷免代表。但這就意味著剝奪了工人階級官僚層的特權，或取消了在工人運動中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工人官僚的特權。同時，斯大林派與社會民主黨的官僚層，都是鄙視工人階級的。但他們多少有點維護工人利益，因為他們需要保住工人官僚隊伍的上層地位。

沃洛廷接著說，在生產手段國有化了的國家裡，官僚特權同其宗旨是直接衝突的，因為財產私有制正是根據這個宗旨而得以廢除的。因此在這樣條件下，官僚特權也是同工人階級最基本的政治權和自由權發生直接衝突的。如果工人有了政治權，官僚層就不能維護他們的特權了。正因此，官僚層不得不排除工人的政治權利。

沃洛廷的最後結論是：東方國家的極權主義專制政府和西方國家的議會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同一個銀幣的兩面。工人官僚們的官僚特權就是建立在這統一體的基礎上。

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是要軟化工人階級，使工人運動去適應資產階級統治。但要達此目的，他們又必須給工人以某些最低要求的滿足。這就是很久以前已經開始了的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徵兆。

沃洛廷說：「里昂·托洛茨基斷言，斯大林派和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是工人組織中官僚階層，官僚階層不是也不能是資產階級，這是絕對正確的。然而，在他們的實際政策中，在資本主義正在衰退的現有條件下，右翼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派，會同法西斯份子和自由派份子去維護資產階級秩序——他們越來越靠近了。由此可見，左翼革命力量的任何一派都不允許去支持斯大林派或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花招。任何試圖組成這種聯盟的人，都是對工人運動的背叛。」

費利克斯·克雷塞爾（*Felix Kreisal*）美國的托洛茨基派學者，他也是這次會議的翻譯者，回顧了199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梅德維傑夫（*Medvedev*）所寫的書《俄羅斯的資本主義》。梅德維傑夫是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著名評論家，在勃里日涅夫時期，他是持不同政見的歷史學家，70年代和80年代時，他為一批斯大林主義改革派提供了理論支持。費利克斯認為梅德維傑夫各種著作的大量出版都得到了支持。他的思維激勵了衆所周知的歐洲共產黨和歐洲斯大林主義的發展。1999年在俄國出版了《世界社會主義網址雜誌》卷11（25）上，費利克斯以簡短篇幅評論這本書時提出一個問題「在分析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時，他的觀點是如何展開的？」

梅德維傑夫這本書對此作出了回答。這本書對前蘇聯社會文化的崩潰以及衛生、社會生活方面的災難性後果，提出了批判。梅德維傑夫駁斥了一種共同的解釋，例如陰謀論等等。費利克斯說，他把前蘇聯的失敗歸因於軟弱無能的領導人的愚蠢以及犯了誠實的錯誤。

費利克斯接著說，不論是梅德維傑夫的結論或他所駁斥了的那些論據，都是錯誤的、非科學的、近視的和沒有價值的。但應如何去解釋梅德維傑夫的破產呢？費利克斯將梅德維傑夫的破產歸之於他的思想方法，這種思想方法實際上是帶有斯大林主義的特徵，是把社會發展從客觀的歷史條件割裂開來，力圖把未完成的、屬於部份現象的矛盾，強說成是屬於已經完成了的範疇，這種思想方法是非辯證的。

梅德維傑夫思維方法的另一特點，同樣是斯大林主義特徵，把國家及其組織和領導作用神化了。梅德維傑夫舉了幾個擁有實力的國家為例，包括中

國、南朝鮮、新加坡、越南及烏茲別克，而且頌揚了這些國家取得了「經濟上成就」，這是由於它們在領導經濟中發揮了強有力作用。費利克斯堅持說，像這樣的思維導向幾乎沒有給人類提出希望。

安妮·多拉齊奧（*Ane Dorazio*），是紐約威斯特切斯特社區學院教授。她談到了托洛茨基著作《日常生活問題》。

（以下摘譯）安妮特別提到托氏在這部著作中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學，要把關心文化作為優先的任務。這是談及到習慣與風俗，科學與技術，文化與教育以及辯證法。托氏特別強調要遵守時間，開會要及時，要講究文明禮貌，語言必須純潔，不能使用下流語言。文化既是階級壓迫的主要手段，但也是人類解放的手段。資產階級通過教育，可向工人灌輸資產階級價值觀，但要推翻資本主義同樣也要通過教育。托洛茨基在寫到技術和科學時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科學，更需要一切部門的科學。科學的最偉大成就，並不是在技術上取得明顯的收穫，而是科學有預見的能力，這便走向辯證法。安妮接著說，辯證法是科學，可應用在物質條件上，幫助我們去理解複雜的發展進程。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只是靜止地看世界。

安妮的結論是，托洛茨基在其論文中提醒我們要注意，「人世間的，但又是基本的日常活動，這些行動會使工人階級樹立起信心，創造文化」。

在這二天會議上，瑪里琳·霍·道尼提出了《過渡綱領》問題。她是接過前一天伊麗婭·布德雷茨基（*Ilya Budraitsik*）發言未盡的話題，她說托氏提出過渡綱領是他一生事業的最高點，是今天世界為組織社會主義革命的關鍵綱領。瑪里琳突出了應用過渡綱領的實際方面，強調有必要成立工廠委員會/車間委員會和消費委員會或具有相同作用的委員會作為工人控制經濟的根本或培養的學校，儘管托洛茨基是在1938年寫下這過渡綱領的，但仍有美國同志們爭議說，工人對此並無準備，工人還是太落後，太消極。托洛茨基回答說，唯有用這綱領來直接介入革命者，工人的落後性和消極性才能克服。瑪里琳接著說，今天托洛茨基主義者仍然要堅守此綱領，但誰也沒有在實際上應用它。然而這綱領在今天與在1938年是具有同樣的現實意義，同樣的不可或缺。

在討論期間，有不少問題提出來。有人不同意費利克斯對梅德維傑夫思想具有斯大林主義特徵的說法，他們認為倒不如說，梅德維傑夫的方法代表了小資產階級思想，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去批判斯大林派的。與會的一位婦女代表質問道，民主社會主義是否有可能在現時世界上實現呢？民主社會主義沒有在蘇聯發展起來，也沒有在任何別的國家發展起來。不僅是梅德維傑夫，並且還有許多俄羅斯人都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出現，才能挽救國家擺脫危機，因為許多俄羅斯人已經成為流亡難民或者是他們自己國家的奴隸，這都因為國家太軟弱無能了。

另一位婦女代表問道，為什麼有人喜歡強有力的國家呢？國家把保衛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我們可在各種勞工衝突過程中看到了這一點。她指出：「要記住魚是從頭部先開始腐爛的。」主要問題是國家對人民沒有負起責任來。

費利克斯詳盡地解釋說，梅德維傑夫之所以愛好強有力的國家，實際上是以強有力國家的成就為基礎的，這些成就來源於國家有能力迫使工人服從國際帝國主義領導人和資本家的指令，而這些人正是為了確保他們更大的貸款和投資。這就是為什麼梅德維傑夫的立場會以反工人階級為其歸宿點。

薩瓦斯·邁克爾·馬特薩斯 (Savas Michael-Matsas)，是從希臘來的代表，他指出托洛茨基對文化以及對生產力下的定義是一致的，即認為人力的總體定能戰勝自然，這就反映了托氏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及斯大林派的機械方法之間的深刻分歧（他們認為生產力只是生產手段，而文化是上層建築）。他也反對洛勃·瓊斯斷言資本主義已在俄羅斯復辟了。首先，決定生產模式的社會性質，並不取決於有關財產法律形式的數字。他舉例說，在希臘，56%企業是屬於國家所有，但這並不能使希臘成為工人國家，其次，如果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已經復辟了，就必須肯定自1991年8月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一直在進行；如果我們這裡所有的早已是資本主義生存方式了，那麼就會提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難道有了資本市場嗎？有了勞力市場嗎？薩瓦斯說：「沒有」。怎麼能說價值法則決定了後蘇維埃時期的行動法則呢？薩瓦斯認為不能這樣說。

大會期間，由烏克蘭的年輕托洛茨基主義者，奧利·維尼克提出的考證是令人最感興趣的事。奧利是烏克蘭工人國際委員會支部工人抵抗組織的成員。他考證的問題是托洛茨基的誕生地亞諾夫卡 (Yanovka)，屬於赫爾松省。他說在斯大林時期，亞諾夫卡屢次改名。後經反覆研究，並派特遣隊去探索，最終確定現今貝里斯拉夫卡村即19世紀的亞諾夫卡村。

烏克蘭托洛茨基派正在調查散居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在加拿大及美國的第四國際有聯繫的各組織之間存在的是何種關係。他們希望從美國來的托洛茨基委員會的會員將能幫助他們學習更多知識，如何來處理烏克蘭民族自由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烏克蘭左翼反對派之間的聯繫。他們已開始收集有關這一問題的許多資料。迄今為止，他們經過調查，已確定在烏克蘭存在著地下托洛茨基派……他們是從左翼反對派中分裂出來的托洛茨基小組的固定網。他們並不是為了抽象的興趣進行調查的，而是為了推廣正確的政治綱領和策略，以便在今日的烏克蘭開展我們的工作。他們的政治工作已取得成就，並在烏克蘭13個地區已擁有自己的支持者。

委員會的未來計劃

1. 大會組織者審查了將「里昂·托洛茨基」著作譯成俄文的工作進程。大部份工作量已經完成，剩餘部份正在校對中，準備交付出版，預期一年內出版發行。

2. 委員會計劃，要出版巴爾幹文本的托洛茨基著作，利用光盤上讀存儲器，就易於準備出版，委員會的一個小組要找出版商並為其寫序。沃耶科夫 (Voyeikov) 教授建議在莫斯科成立托洛茨基研究所，定期集會並討論托氏著作和思想各個方面。他們計劃一年內有兩次能編輯出版研究所收到的論文集。

3. 委員會決定明年在烏克蘭召開第六次大會，日期定在2001年10月，地點在烏克蘭的基洛夫格勒。還將組織一次到托洛茨基的誕生地貝里斯拉夫卡村旅遊。當地烏克蘭托洛茨基委員會支持者及托洛茨基主義者準備建立托氏生平及著作博物館。

(譯自《第五屆托洛茨基國際會議報告》)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四)

曼德爾

第十一章

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從小就喜愛文學。他在1917年回到俄羅斯之前的許多年中，發展了眾多對古典、近代作家的評論文章就是這一點的證明。凡希伊努爾特(Jean Van Heyenoort)報道，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國和挪威等國流放時，總在午餐後抽出兩小時來休息和閱讀小說。〈1〉但是，左右托洛茨基的思維的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係必然引導他對文學的愛好超越了光對某某作家、某某作品的判斷，進展到更一般的理論思考。

托洛茨基對大眾化文學的社會效果有非常敏銳的感覺，他是首先認識到電影的巨大、普遍的影響力的人們之一。〈2〉書本與電影，以其能夠達到、影響千千萬萬人們的力量，會是教育群眾、發展階級意識和日後建設無階級社會的一個絕對必要的工具。但是這種普及化本身卻不能進一步地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它能在什麼條件下實行這個功能，它能在什麼條件下促進廣大勞動群眾的自我瞭解、自我活動和自我實現？

為了接近這個問題的答案，托洛茨基從兩個角度來看它：作為〔包括繪畫、雕塑、音樂、文學等的〕藝術消費者的讀者和作為藝術家的作者。〈3〉他在他的關於文學和藝術的著作中，顯示出對藝術的特殊性及對藝術作品的特殊性的深切了解，而這些著作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實踐與敏感性的統一的一個感人至深的例子。〈4〉

根據托洛茨基的看法，在藝術中，人表達了對和諧的需要，也表達了對充分利用生活不得不提供的各種可能性的需要；那些東西他是不能在階級社會中找到的。因此，每一個真正的文學作品，同時是對某種在人道上不夠格的社會現實的一個抗議。他因此在基本上區分像〔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那樣只是冥想的作家和那些描述讀者可認出是他自己的社會現實、社會問題的作家。

更一般地說來，托洛茨基對知識份子的、使它與商業、工業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不同的社會性質，採取一個比較正面的看法：

“它與社會的文化支脈在職業上的聯繫、它的理論概括能力、它的思想的靈活性和機動性，總而言之它的智能。面對着社會的全部機構轉移到新手中這個無可逃避的事實，歐洲知識份子將會能夠使他自己相信，如此建立起來的條件不但不會把他們扔入深淵，反而會在他們

面前開啓對技術的、組織的和科學的力量應用的可能性。”〈5〉

至少在蘇維埃俄國的內戰和生產力下降的特有情況下，這個預測證明是太樂觀了。可是，它在1921年之後就日益變成真實了。

但是，創造力豐富的作家之寫小說和詩歌，不像煉金術士那樣用他的實驗室的儀器和工具來尋求黃金或者青春的秘密。他自己的個性，他自己的表達感情的方法，在一般的，不合適的社會現實和個人的藝術作品之間起着中介的成用。藝術永遠是人類歷史和個人命運之間的聯結點。托洛茨基在作家身上看得最重要的因此是，對自己和別人的忠實，他把這個特徵描述為自發性和真實性。〈6〉虛偽最終來自自欺，而自欺必然導致對別人的欺騙。

托洛茨基在對一件文學作品作出評價時認為重要的，除了自發性之外，就是作家的意志，就是一般地反映在這本小說的各個人物上的意志。托洛茨基極不喜歡被動的人，即是沒有自己的意志，認為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人們。所以他不但對普魯斯特和〔法國小說家〕季洛杜(Giraudoux)、而且對〔俄國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的反應不好。對托洛茨基而言，對一切非人道、反人道的事物的反叛、排斥和抗拒，是做人的基本責任。只有這樣一種出於本能的排斥，才會最終地導致了解建立社會主義、建立無階級社會的必要，導致了解革命的必要。因此他才會大大地對〔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和〔俄國作家、思想家〕托爾斯泰(Tolstoy)的極大欽佩，不管他們在思想上的局限。這些是作家把

活生生的、主動的人物，把試圖成功或不成功地決定、改變他們自己命運的人物，引上舞台。

自發性、真實性、忠實和堅強的意志——這些都是創造力的必要先決條件，而這些要求絕對獨立性。正像馬克思那樣，真正的科學家對於假造研究結果的學者有着最大的蔑視，作為真正作家的托洛茨基也一樣，鄙視那些按照老板、統治階級、國家或黨領袖的要求而寫作的小說家。沒有獨立精神，換言之，沒有道德的完整，就沒有真正藝術。

這當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存有幻想，以為藝術家或作家個人的思想和作品可以完全不受社會的影響。沒有一個作家能夠脫離他自己的時代，他自己的社會的影響，能夠寫出不有意或無意地表達社會運動、社會利益影響的東西。但是(有意、半有意或無意的)黨派心是一回事，客觀、忠實卻是另一回事。一個作家可以激情地贊同現存秩序，可以保衛它的利益，可以是一位心悅誠服的保守反動份子。但是他只能夠成為一位偉大作家，如果他如此傳送這個信息以致不歪曲現實；換言之，如果他不欺騙自己和別人。因此歌德、巴爾扎克都是卓越、偉大的作家，雖然他們思想保守。保守無政府主義者托爾斯泰也是這樣。

對具有反動思想的作家是如此，對認為自己是進步份子或是社會主義者的作家，也是如果不是更是如此的話。作家可以譴責階級社會、贊美革命、羨慕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但是不可以畫出一幅情況不存在的圖畫，不可以假裝。就像列寧所說的：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

在托洛茨基的眼中，左拉(Emile Zola)、法蘭斯(Ignacio France)、伊格納多西隆(Ignacio Silone)、馬梯納特(Marcel Martinet)以及特別是傑克·倫敦(Jack London)等人都是偉大作家；阿拉貢(Aragon)、西蒙諾夫(Simonov)和(除了《The Fire》這個作品之外的)巴布斯(Barbusse)等人就不是。

作家應該有絕對獨立精神這個要求，意味着工人國家應該自制以避免任何形式的規定或干涉。托洛茨基在1924年所寫的《文學與革命》(8)中就絕對堅持這點。中央委員會在1925年在托洛茨基的影響下作的決議案就這樣說：“共產主義批評家必須去去除任何形式的假情假意的、半文盲的和自我滿足的優越感。…黨贊同各文學學派之間的自由競爭。…任何其他解決辦法都會是拘泥於形式的、官僚主義的。…黨不會賜與任何團體文學出版方面的壟斷權。黨不能夠給某一團體獨佔的位置，即使這個團體在思想上是完全無產階級性的。這種做法等於破壞了無產階級文學的本身。黨相信，在有關文學的事務上，根除每一種專橫、不稱職的行政干涉是必要

的。”(9)

這個政策是與日丹諾夫的‘文化政策’、毛澤東的馬基雅弗利主義口號“白家爭鳴”完全不同的，因為後兩者只是為“右傾分子”所設的一個陷阱，只要他們一鳴放，他們就會遭到壓制。作家應該完全獨立的要求，不但是針對蘇聯的暴虐的官僚層。它也是針對那些對藝術家施加政治和金錢壓力的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家。官僚層和資產階級有時會聯合行動，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里姆林宮曾經向英國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它阻止喬活·奧威爾(George Orwell)出版他的諷刺小說《動物農莊》(Animal Farm)。(10)

但是這事情有另外一面：自由和客觀並不表示，在保衛工人的利益上，堅持非黨性或採取節制態度。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時常對為數甚多的文學學派例如象徵主義派、形式主義派和未來主義派作出嚴厲批判。他也對革命在文學界的“同路人”，例如“塞拉皮恩兄弟們”和伊凡諾夫等人採取極其批判的態度。任何其他態度就會是不誠懇、不合邏輯的。你不能夠要求別人應該有批評、言論的自由，而在這同時不讓你自己有。你不能夠要求，在評論一件文學作品時，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準則。

因此，在《文學與革命》中的兩個部份——托洛茨基要求工人國家不應該對作家進行干涉的部份和他對俄國和外國的作家定出嚴厲的批判標準的部份——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他高度贊揚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把他們兩人的悲慘命運描述為蘇維埃熱月反動的一個產物。他在對高爾基的評價中，區分這位作家一生中的兩個時期。年青的高爾基，從一位無業游民的詩人開始在1905年的革命的影響下，走向無產階級的一邊。在這同時，這位自學成功的作家變成所謂“文化財富”的一位熱情保衛者。這使他很不滿意他所認為的十月革命的最壞的過火行動。這就成為使他以後比較容易地不顧他的1917年的政治立場走向專制主義斯大林陣營的橋樑。接著就開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時期，非創造性的時期。托洛茨基說，高爾基死在他沒有更多話可說的時候。但是“這位偉大作家，這位偉大人物，在一段歷史時期中，留下了他的痕跡。他幫助開啓了新的歷史道路。”(11)

托洛茨基對文學批評的這個雙重面貌，來自某些更基本的東西，某些他與列寧、部份地與布哈林共有的東西：排斥“無產階級文化”的神話。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一個被壓迫的階級。它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仍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階級。因此它在專政之下的任務不是創立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它

的主要任務是把資產階級之前及資產階級的文化中有價值部份拿來為己所用。這就為未來社會主義文化第一批因子的出現，開啓道路。將會有的是壯麗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會是無產階級文化。〈12〉

這些觀點漸增地受到無產階級文化運動(Proletkult movement)的排斥。這個運動在1932年至1934年的時期中受到當局的支持。正像在經濟和一般社會關係中一樣，這段極左時期只不過是向蘇維埃熱月反動的鞏固過渡的時期。就文學、藝術而言，熱月反動的時徵，並不是極左的無產階級文化，而是一種對小資產階級偏狹心理過於頻繁的模仿。托洛茨基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態度沒有別的，只有蔑視：

“當代官方蘇維埃藝術的式樣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標題。這個名稱顯然是由某藝術家協會的某會長所起的。它的現實主義是由一種對十九世紀偏狹的陳詞濫調的模仿所組成的。它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以它之使用偽造的相片來描繪從未發生的事件所表達出來的。…配備著筆桿、畫筆和鑿子的官員們，在配備著毛瑟槍的官員們的藍監督下，向‘偉大的’、‘英明的’領導人們致敬，其實後者毫無偉大或英明可言。〈13〉

但是托洛茨基確信，蘇聯的文學與藝術的這種“比倫式流放”會長久持續。〈14〉最近幾年的俄國和蘇聯社會的發展已證明他是正確的。他也著重藝術和科學，對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日益重要的：“甚至衣食、住和初等基本問題已被解決的時候，這仍然不將意味著新歷史原則——即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只有科學思想的進步、新藝術的發展才會證明，這個歷史種子不但已經長成一棵樹，而且已經開始開花。在這個意義上，藝術的發展才是每個歷史時代的活力和重要性的最高標準。”〈15〉

純粹的無產階級藝術或文學是不可能有的。然而，資產階級社會能夠含社會主義文化和文學的開始因素，而資產階級社會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甚至能夠更多地包含社會主義文化和文學的開始因素。這些開始因素能夠主要地在物質本身找到。托洛茨基要求，作家應該關切對工人有影響的實際問題和議題——再說一次，不要加以美化。

社會主義文學的這些開始階段——托洛茨基時常使用‘革命文學’這個專門名詞——就以下這個形容詞的最好意義而言，應該是教性的(在形式上不是道德說教的)，為這些開始階段首先是有利於提高工人階級的一般文化水平。在這裡，托洛茨基是指極初級的問題：掌握語言，並以正確方法說出，清清楚楚表達你自己的想法，審慎地思考，把事情放在與之有關的較廣闊的環境中來考

慮，把個人命運與階級的命運聯結起來，等等。托洛茨基在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問題方面最重要的門徒是維克托·綏奇(Victor S. Gollancz)。他使用了“無產階級人道主義”這個專用名詞。〈16〉

另一問題是如何克服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之間的巨大差距，換言之，如何鼓勵工人們自己去寫作。〈17〉托洛茨基和綏奇都沒有任何幻想，以為這個問題可以容易地且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從文學創作、無產階級國家，文化政策等問題的分析，現在我們到達另一問題：文學怎樣影響廣大群眾？我在這個問題上所探討的是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係：文學表達的那些形式會幫助廣大讀者群達到更高文化水平？陳述的形式必須引起讀者的興趣。它必須鼓勵讀者繼續閱讀。人物的性格與行動必須使人看得懂。它們必須提醒讀者他所熟悉的東西，然後引導他超越這點到達不熟悉的东西。這個作品必須既有娛樂性、有能啟發人的思想。它必須能激起讀者的批評能力。讀完這本書後，他必須有一個感覺，認為他現在比以前更了解人民社會。

托洛茨基所高度贊揚的小說，例如西隆的《豐特馬拉》、傑克·倫敦的《金失蹤》，都有以上這些特徵。當然還有為數眾多的其他例子。普里莫·列維(Primo Levi)的《扳鉗》(1978年，企鵝版1987年)，這個世紀的偉大文學成就之一，可能會使托洛茨基讀來極感興趣。它的男主人翁是一位經常與各種各樣包括蘇維埃官僚在內的決意指揮，操縱他的機構發生衝突的手工工人。普里莫·列維實際上要非常接近托洛茨基的思想的。這位老人可能會喜歡《扳鉗》中的這些有力的話語：當然，我們確實提出抗議：見證人，再一次檢查，訴訟。…幾年過去了，但是訴訟仍在進行。…你想它會怎樣結果？我已經知道，當鐵的東西變成紙的東西的時候什麼樣的事情會發生。它會以錯誤告終。

這當然不意味著，小說和故事，因為其形式時殊而沒有讓廣大群眾讀到，就沒有關的或社會的價值。托洛茨基強烈排斥這種反對先鋒主義或複雜的表現方式的狹窄的，假無產階級性的偏見。托洛茨基知道，不偏離官方傳統，不背離已建立的觀念和情感的法規，不放棄已被習慣的粉飾所掩蓋的形象和語言慣用法，一個有創造力的人就不能向前進。

文學上每一個新方向都在尋求文字與感覺之間更直接、更忠實的關係。反對掩飾和虛偽的鬥爭就變成反對在社會關係中弄虛作假的鬥爭：

每一個真正藝術作品包含一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主動或被動的、樂觀或悲觀的、反對現實的抗議。每一個新的藝術派系是以一種反叛而開始的。我們已經看出，

資產階級社會的權力，在於它在長時期中運用壓力、警告、抵制和恭維等的結合來控制、同化‘反叛的’藝術學派，給它官方‘認可’的能力。對於這個成了問題的學派而言，這種‘認可’總是結束的開始。但是後來，被官方承認的學派的左翼比較激進的一翼發動了一次新反叛，或者新一代的有創造力的、放蕩不羈的文化人開啓了一個新反叛運動，這些流派和這動在它們自己的時代中也會進入學院的大門。(18)

因此才有托洛茨基對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自發的同情。這在1938年，在〔法國詩人、評論家、超現實主義運動創始人之一〕勃雷東(Andre' Breton)到墨西哥旅行期間，導致由勃雷東和〔墨西哥畫家〕里維拉(Diego Rivers)所正式簽名，雖然在事實上由勃雷東和托洛茨基所共同(不是沒有爭論地)撰寫的宣言‘爭取獨立的、革命的藝術’。一個“獨立革命藝術聯盟”在這同時被建立起來。

要作家與形式和內容上的撒謊習慣和虛偽鬥爭是不夠的。採取悲觀、絕望的態度與虛偽鬥爭的人們，如果既不能為這個建立在弄虛作假之上的社會找出、又不能為這樣的社會指向一條出路，到結果，就會把現存秩序當做唯一可能的社會來保衛。〔法國小說家〕塞利納(C' eline)的《長夜漫漫的旅程》的新文體強烈吸引了托洛茨基，但是他在塞利納的作品中直覺地認出反動因子。以後的事件証實了這點。(19)

可是，貌似悲觀的傑克·倫敦(Jack London)在其小說《鐵蹄》中以幾乎預言的直覺描述法西斯獨裁的可能性，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作家。在倫敦的這本書中，反叛的潛在泉源是群眾，不像在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只有幾個人。(20) 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托洛茨基終其一生是一位革命現實主義者。為了自覺地改變社會，改變人生，一個人首先要知道、認識、了解和解釋。但是他是一位把夢想這個“希望的基本原理”結合在他的現實之中的現實主義者。

註釋

- (1) 見Jean Van Heyenoort 的《與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在一起》，馬薩諸塞州坎黑奇，1978年。
- (2) 欲知托洛茨基對電影的看法，見他的《日常生活的各種問題》，紐約1973年。
- (3) 托洛茨基在這裡運用了那個料想不到的、合適的表達法：“每個藝術家都是用腦力來創造的”。
- (4) 托洛茨基也是一個文學“家”。二十世紀的大文體家之一。

- (5) 見刊在1964/65年的《第四國際》上的‘智識份子和社會主義’(1910年)一文。
- (6) 這個引句是從法文本的《文學與革命》(《Literature et revolution》巴黎1974年)的第362-3中來的。這個法文本比英文本(《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密歇根1968年)包括材料多些。
- (7) 見那維爾(Pierre Naville)的《Trotsky Vivant》(《活生生的托洛茨基》)，巴黎1962年，第96頁。
- (8) 第一個英文版本是在1925年由國際出版社在紐約出版的。德文版是於1924年在維也納出版的。
- (9) 引自《Victor Serge: Schriftsteller and Proletarier》(《維克托·綏奇：作家與無產階級》)，(美國河畔)沃蘭克福1977年，第63-4頁。我到現在還不了解為什麼托洛茨基從來沒有對維克托·綏奇的小說作出評論，其實他的一些小說，例如《Naissance de notre force》(《我們的力量的誕生》)和《L' affaire Toulayev》(《吐拉耶夫事件》)等都是本世紀的偉大革命小說之一。
- (10) 見W.J. West 所編的喬治·奧威爾的《後期作品》，紐約1988年，第61頁。
- (11) 托洛茨基，《Portraits — political and Personal》(《人物描述——政治的和私人的》)，紐約1977年，第160-61頁。
- (12) 《文學與革命》，第162-4頁，從第196頁開始。美國小說家，以後加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James T. Farrell 在他的原先在1936年出版，以後在1962年於紐約再版的《A Note on Literary Criticism》(《關於文學批評的一本筆記》)一書中得出相似的立場。我們不知道當時Farrell 是否讀過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
- (13) 同上書，第338頁。
- (14) 同上書，第353頁。
- (15) 同上書，第21頁。
- (16) 見同上書的綏奇部份，從第97頁開始。
- (17) 法文本《文學與革命》，第74頁。
- (18) 同上書，第354頁。
- (19) 見Paul Siegel 所編，1970年紐約出版的《托洛茨基論文學與藝術》一書中的(C' eline 和 Poincare'，小說家、政治家’一文，第201、203頁。
- (20) 法文本《文學與革命》，第346-8頁。

Soaring medical expenses aggravate peasants' sufferings

Jun Xing

The launch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has aggravated social polarizations and devastated the conditions for social health and sanitation. According to Pan Yu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Bureau, who spoke at the recent Congress of the Asia-Pacific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eld in Shenzhen,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ergy crisis are the result of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At present, 90% of rivers flowing through cities are seriously polluted; almost 300 million peasants are drinking sub-standard water; about one third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live in serious air polluted environment.¹

W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rapid, comparing 2003 over 1997, the state's financial income has increased by 1.5 times, total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by 4.5%, yet the number of hospitals and clinics has decreased by 7.3%.² As the health welfare system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is being eliminated, the fees for consultation and medicine charged by state hospitals and clinics have risen a lot, and certainly the increase rate has far exceeded the increase of actual income of the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Times*, Rao Kegin, Director of the Health Department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Centre, their survey of the outpatient fees and hospitalization fees between 1993 and 2003 showed that, deducting inflation, they had risen at an annual rate of 14%. In 1993, the outpatient fees and hospitalization fees were respectively 21 yuan (USD2.56; USD1=RMB8.2 yuan) and 933 yuan, but in 2003, they had risen to 75 yuan and 2,233 yuan.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 of the Health Department from sampling surveys, the number of sick had risen. The surveys of about 200,000 people in 1993, 1998 and 2003 indicated that sick people had risen by 710 million people within the ten years, totaling 5 billion. However, those seeking treatment had decreased. The fortnight rate of treatment seeking of the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 fell from 17% in 1993 to 13.4% in 2003. The hospitalization rate was equal to ten years ago, that is, 3.6%. Among those who did not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fter falling ill for a fortnight numbered almost 50%, and of these, 36%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39%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did not seek treatment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surveys also investigated into the reasons for discharge from hospital. 43.3% of patients requested discharge, of which 63.9% were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³ In reality, many patients were forcibly expelled from the hospital because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Some time earlier, the *China Economic Times* had

quoted from the Chinese Health Department that the per capita medical expenses of outpatients from hospitals directly operated by the Health Department were as high as 163 yuan, with medicine constituting 60% of the total cost. Yet the average urban family income in September 2004 was only 713 yuan. Figures of the Health Department indicate that the average expense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from hospitals directly operated by the Health Department were as high as 7,000 yuan, with medicine constituting half the cost. A report from China Consumers Association said that due to the high medical costs, about 50% of the sick dare not seek medical treatment.

One reason for the profiteering from medicine is structural: medical institutions need to self-finance the medical personnel from the profits in selling medicine. Hence, such profit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come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Selling blood due to poverty has been one cause for the spread of AIDS in China. Official figures have it that there are 840,000 HIV positive persons, but 90% cannot afford treat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number of affected increased by 18.3% in 2003 over 2002, ranking 5th in the country. But Hospital No.8 that specializes in AIDS treatment had only 400 patients. Cai Weiping, Chief of the Contagion Unit of Hospital No.8, gave this figure, which was very low hosp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AIDS experts estimate that the actual figures of AIDS patients in China would be far high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stimates that if tough measures were not adopted, China's HIV carriers would rise to 10 million in 2010.⁴

The peasants are hardest hit by the high medical expenses. Zhu Qingshe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Health Department, said that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peasants in 2003 was 2,622.2 yuan, but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fees each time for rural residents was 2,236 yuan. Since peasants' net income includes income in kind, that means their cash income for a whole year cannot even pay for one hospitalization. Thus, over half the peasants cannot afford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nd death at home was as high as 60-80%.

From October 2002,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whereby peasants can voluntarily participate by paying 10 yuan a year to the township hospital, and the government gives a subsidy of 20 yuan for each person. Up to the end of June 2004, 68.99 million peasant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is scheme, and 41.94 million medical cases have been reimbursed.

However, this means 90%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ong Kong

- 2 Against collus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rchants Zhen Yan
 4 On the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5 Some responses of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to Long Hair's winning the election..... Lang Guo

China

- 6 Social inequalities intensif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bureaucracy and the people Zhang Kai
 9 Soaring medical expenses aggravate peasants' sufferings Jun Xing
 11 SAR epidemic lays open health care decline in China Michael Schreiber

International

- 13 Russia: Putinian continuity David Seppo
 14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2004 Financial Budget (tr.) Zhao Jing
 14 Agains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long-term detention of foreigners (tr.) Zhao Jing
 15 Yiye Bay residents gathered to protest the USA helicopter incident (tr.) Zhao Jing
 15 Senior age crimes increasing in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tr.) Zhao Jing
 16 South America's new revolt Chris Harman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Documents

- 19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s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xcerpts) Xuan Chuanshu
 21 Introduction to the Statute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r.) Wei Ran
 22 Introduction to the Document Jose, Roman, Salvatore, Vartong
 25 Resistances to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opening for a new internationalism (tr.) Wang Jing
 35 Ecology and Socialism Michael Lowy

History

- 37 Our esteemed veteran Liu Jialiang Li Ping

Theory

- 39 Highlighting the actual significance of Trotsky's works: Fifth Conference on Trotsky Vogt-Downey

Special Article

- 46 Trotsky as Alternative (part 14)..... E. 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50 Soaring medical expenses aggravate peasants' sufferings Jun Xing

are not subscribed to the scheme.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also finding it hard to give the subsidy, as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debt of rural governments is over 1,000 billion yuan, meaning an average of over 1,000 yuan per rural resident, which is equivalent to 40% of the average peasant's annual income. These are heavy financial burdens for rur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peasants. The suffering of the peasants is one major reason for the increasing peasant rio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2 December 2004

¹ *Apple Daily*, 30 Nov 2004, quoting "Renmin Net".

² Calculated from *Qiu Shi* magazine, No.19 of 2004.

³ *Wen Wei Po*, 23 Nov 2004, quoting Zhongxin web.

⁴ *Wen Wei Po*, 2 Dec 2004,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1卷第3/4期 (總第217期)

2004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 〈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 9846 3428 傳真: 3494 1762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 (852)9846 3428 Fax: (852)3494 1762

E-mail Address: october_review@yahoo.com

Web Site: <http://www.octreview.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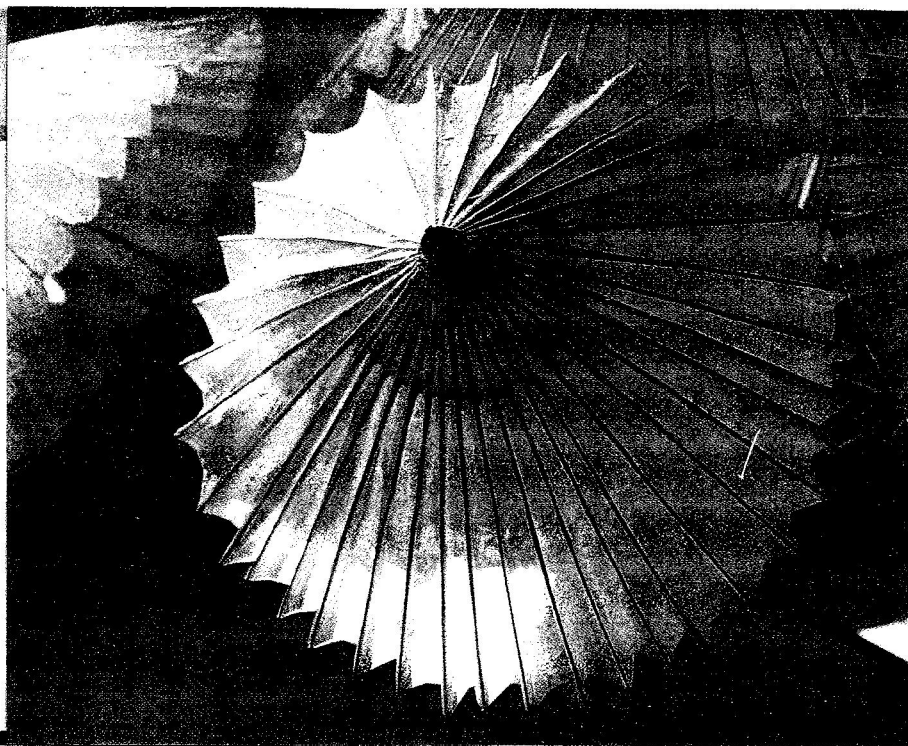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 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第31卷第3/4期（總第217期）

2004年12月31日出版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香港	2	反對官商勾結 損公肥私.....	振言
	4	立法會選舉面面觀.....	本刊評論員
	5	大陸人民對長毛當選的部份反應（加拿大通訊）.....	浪果
中國	6	社會不公，更激化官民矛盾.....	張開
	9	醫療費用高漲 農民看病倍難.....	軍行
	11	中國保健事業的衰退.....	米高·施禮伯
國際	13	俄羅斯：普京的連續性.....	大衛·塞波
	14	評日本政府2004年度財政預算案.....	遠山裕樹
		抗議日本政府長期拘留外國人的不當行為.....	北野
	15	宜野灣市市民集會抗議美軍直升機事件.....	趙京譯
		現代日本社會急劇增長的高齡犯罪.....	趙京譯
	16	南美洲的新反抗.....	哈爾文
特輯	19	第四國際對當今世界的評判（詳細摘錄）.....	軒傳樹
	21	第四國際章程序言.....	蔚然譯
	22	《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建立新的國際主義》引言.....	祖思、羅文 沙爾瓦多、華登
	25	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建立新的國際主義.....	王敬譯
	35	生態與社會主義.....	羅維
歷史	37	尊敬的劉家良叔.....	李平
理論	39	突出托洛茨基著作的現實意義.....	霍道尼
特譯	46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四）.....	曼德爾
英譯	50	Soaring medical expenses aggravate peasants' sufferings	Jun Xing